



分类号 _____

UDC _____

密 级 公 开 _____

吉林大學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词与物关系的解读

—— 米歇尔·福柯的话语观

申 请 人： 田莉莉

学 号： 2080314

培养单位： 文学院

学科专业： 文艺学

研究方向： 西方文论

指导教师： 张奎志 教授

完成日期： 2011 年 3 月 28 日

独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据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黑龙江大学或其他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而使用过的材料。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田莉莉

签字日期：2011年5月27日

学位论文授权使用授权书

本人完全了解黑龙江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同意学校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黑龙江大学可以将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他复制手段保存、汇编本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田莉莉

导师签名：张奎志

签字日期：2011年5月27日

签字日期：2011年5月27日

学位论文作者毕业后去向：

工作单位：

电话：

通讯地址：

邮编：

中文摘要

“话语”是福柯思想中至关重要的一个概念，他的话语理论在国内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这部著作中福柯从探讨“词”与“物”的关系入手来传达他的话语观。福柯分析了西方文化的四种知识类型，阐释了不同历史时期“词”与“物”的关系变化，并说明随着两者关系的变化人们对“话语”的理解也不再信守一个原则。福柯的话语理论就是在他细致的梳理西方文化和知识史以及独特的剖析“词”与“物”的关系的基础上诞生的。

本文梳理了福柯话语理论产生的理论渊源和历史背景，解读了福柯的话语理论，阐明了福柯话语理论的意义和影响，同时也提出了新问题——在当今时代“词”与“物”的关系走向如何，这种走向会对文学、对社会、对认识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关键词：福柯；词与物；话语观

Abstract

"Discourse" is a very important concept in Foucault thought. His discourse theory has exerted an important influence at home and abroad. In *Words and Things—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Foucault convey his concept of discourse from exploring "words" and "things". Foucault analyzes four knowledge type of western culture, explains the relationship changes between "words" and "things" in the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 At the same time Foucault explains that as the relationship changes between both of them, people will no longer keep a principle in understanding the discourse. Foucault combed the western culture and knowledge history carefully, and analysis "words" and " things" uniquely. Then his discourse theory was bor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heory origin and historical context, interprets the discourse theory and expounds the significance and influence. Meanwhil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new problems—the tendencies of "words" and "things" in the modern era. And the tendencies will what impact on literature, society and epistemology.

Keywords: Foucault ; Words and things ; Concept of discourse

目 录

中文摘要	I
Abstract	II
绪 论	1
一、论文选题的依据	1
二、论文写作的思路与方法	2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4
第一章 “词”与“物”关系的理论梳理	7
第一节 理论渊源	7
一、西方对“词”与“物”关系的历史理解	7
二、东方对“词”与“物”关系的历史理解	8
三、强调“词”与“物”对应关系探源	11
第二节 颠覆“词”与“物”对应关系的历史背景	17
一、否定“摹仿说”及传统真理观	18
二、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性	20
第二章 福柯对“词”与“物”关系的理解	25
第一节 福柯对西方文化知识类型的解读	26
一、西方文化的四种知识类型	26
二、西方文化知识型转变中的典型形象	31
第二节 福柯对“词”与“物”不对应关系的解读	33
一、“形象的叛逆”	33
二、福柯的话语理论	35
第三节 “词”与“物”的不对应在文学方面的表现	41
一、现代派文学对“词”与“物”对应关系的颠覆	41
二、萨德文学对“词”与“物”对应关系的颠覆	44

第三章 福柯话语观的审视	45
第一节 福柯话语观的意义和影响	45
一、福柯话语观的意义	45
二、福柯话语观的影响	47
第二节 当代“词”与“物”的关系	50
结 语	55
参考文献	57
致 谢	59

绪 论

一、论文选题的依据

将福柯的话语理论作为选题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福柯理论在中国引起讨论热潮，二是福柯话语理论对现实的冲击性。

首先，随着中国与世界各国文化交流的增强，很多国外学者的代表性理论、观点被传入中国，这些理论、观点不仅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而且也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在 20 世纪 60 年代，福柯的话语理论随其著作《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诞生。这一著作自从一问世就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当时的一些人甚至把阅读这一著作当作一种时尚的潮流来追赶。就连福柯本人也对此著作受欢迎的程度表示不解，他说：“这是我写的最难懂、最令人讨厌的书。它本来是写给大约两千名对一系列有关思想史的问题感兴趣的学术界人士看的。这本书为什么如此成功？这完全是个谜。”^①但不管怎样，《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确实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西方引发了讨论的热潮，而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也卷入到这场学术讨论的潮流中来，于是福柯的话语理论在中国拥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的社会、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成为这个时代精神思潮的代表。过去知识分子所遵循的旧有的文化传统也渐渐的被功利文化、实用文化所取代。这样，很多知识分子被边缘化、“去精英化”，也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为“文化偶像的多元化、碎片化、世俗化”。因此，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面临着很多难以解决的新问题，而恰在此时，福柯的理论尤其是他对人文科学的考古研究、对现代权力的谱系分析等都给中国的知识分子带来很大的启发，他的一些分析方法和理论成果也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做研究提供了借鉴。随着对福柯大部分著作、理论的翻译、研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起福柯，故而在中国兴起了“福柯热”。

^①刘北成. 福柯思想肖像[M].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第 144 页.

其次，福柯的话语理论对现实具有很大的冲击性。自福柯的话语理论问世以来，他的批判方法就对各国的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就中国而言，福柯的话语理论以及福柯对权力的分析等就为中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现实难题提供了帮助。9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受到“去精英化”潮流的严重冲击，大部分走向了功利主义，但仍有一些知识分子坚守着精英的阵地。他们对社会不再采用传统的“政治/文化游戏”干预方法，而是采取了“福柯式的干预”，那就是在拒绝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文化的同时，又去发掘新的资源，正如福柯在讨论话语这一概念时，没有陷入传统的探讨中去，而是另辟蹊径，运用新的分析方法并提出话语权力等新的概念一样，以此来达到干预社会的目的。除了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提供干预现实的新武器外，福柯的话语理论还被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学习的基础上赋予新意，从而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提出对现实的批判，这种对现实的独特的发言方式，具有很大的冲击力量。可以说，福柯的话语理论直接或者间接地冲击了现实，为各国的文化、文艺批评等都提供了很大的借鉴作用。

二、论文写作的思路与方法

福柯的话语理论最大的特点就是反常规、反传统。福柯本人在挑战传统思维方式、拓展人类思维视野、解析话语与权力的关系及话语与实践的关系等方面都突破了传统的认识，他的这些新观点、新见解不仅对后人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其影响力也波及到了其他的学科领域。鉴于福柯的话语理论影响之大，本文系统的分析了福柯的话语观，这也是对其影响力的有力解释。但是需要说明的是福柯在《词与物》中所用到的“话语”这一概念是专指“古典语言”，而在原著中多次被提到的“语言”则和本文所说的话语意义一致。福柯在另一部重要的著作《知识考古学》中做了一些术语上的纠正，比如将“语言”换成了“话语”，本文主要以福柯的论著《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知识考古学》等著作作为参考，因此统一使用“话语”这一概念，进而阐述和剖析福柯的话语观。

本文的第一章，是对“词”与“物”关系的理论梳理。我们从三个方面来阐述两者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关系，并且剖析了形成这种关系的原因。福柯通过对文

文艺复兴时期“知识型”、古典时期“知识型”和现代时期“知识型”的分析来阐述“词”与“物”从统一走向分离的变化过程，进而阐释出他独特的话语观。可见，福柯的话语理论是以分析“词”与“物”的关系为基础的，所以本文的第一章就用来系统的梳理东西方社会对两者关系的历史理解以及形成这样一种关系的原因。除此之外，福柯话语理论诞生的历史背景也至关重要，这一理论是时代的产物，分析福柯话语理论诞生的时代背景，可以更好的为解读这一理论做准备。在阐述“词”与“物”关系的理论渊源和历史背景的同时，还需要分析“词”与“物”在早期社会就保持统一关系的原因，我们从哲学和心理学的角度进行了解析，为下一章解读福柯的话语理论做准备。

论文的后两章是主体部分。首先，在第二章我们阐述了福柯在《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中所提到的三种知识类型、知识型转变中的典型形象以及西方文化的两次断裂，这是对福柯观点的梳理。接着就具体阐述了福柯如何看待“词”与“物”的不对应关系，他通过对《形象的叛逆》又名《这不是一只烟斗》这幅画作的分析阐明了“词”具有否定“物”的力量的观点，认为此画体现了文字和形象的悖逆，此时“词”与“物”具有了新的关系，传统的“相似性”原则被打破。但福柯并没有像大多数人那样，认为《形象的叛逆》这幅画的奇特之处仅仅在于语词与事物之间的矛盾，在福柯看来，这种矛盾是不存在的，语词其实已经无声的发挥了作用，使形象得以在“词”中显现。就这样福柯借助阐述“词”与“物”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关系，来说明每个时代的知识类型都会随着两者关系的变化而显示出不同的特征，进而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切知识都是通过描写而得到的，经过中介而被组织在话语中的，只有通过‘词’才同‘物’联系起来的知识。因为，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只是一种话语关系，任何脱离话语的东西都是不存在的。”^①第二章我们不仅阐明了福柯对“话语”的看法，而且还就话语的结构、作用、特征等展开深入论述，这样，福柯的话语观就能鲜明而具体的展现出来了。但需要说明的是福柯理论所体现出来的颠覆性绝不仅仅是福柯的个人特色，对传统的颠覆体现在福柯所生活的时代的各个领域。在理论界有诸如海德格尔、维

^①黄颂杰. 福柯的话语理论述略[J]. 南京社会科学, 1990 年. 总第 40 期.

特·根斯坦、罗兰·巴特等大家，分别用自己的方式提出了语言的重要性，直接或者间接地否定了“词”与“物”的对应，使得“词”高于“物”，动摇了两者传统的平等地位。除此之外，还有文学家、语言学家、绘画家等，他们通过各自的作品向人们诠释了“词”与“物”的不对应。他们的主张有的为福柯的话语理论提供了背景上的支持，有的则直接被福柯所用，成为支撑他话语理论的重要依据。

文章的第三章是对福柯话语观的审视，一方面谈到其意义和影响，客观的评价了福柯的话语理论；另一方面，又谈到了在当代“词”与“物”两者的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及今天的我们是否还要遵循着两者的统一原则。结语部分，需要探讨福柯话语理论所诞生的时代——后现代文化的文化背景。对后现代文化进行评价有利于更好的理解福柯的话语观。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对于福柯话语理论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首先，我们从国外的研究现状说起。自福柯的话语理论问世以来，西方学者就没有停止过对它的解读和研究，它的影响力不仅限于哲学领域本身，而且涉猎到了文学、新闻学、社会学等各个学科。福柯在论述他的话语理论时所体现出的批判精神和向传统思维方式挑战的做法对当时的西方人及其后人都形成了深刻的影响，正如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哈贝马斯所说的那样：“在我这一代对我们的时代进行诊断的哲学家圈子里，福柯是对时代精神影响最持久的。”^①也正是因为福柯话语理论极大的影响力，所以才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中西方学者加入到研究它的队伍中来。西方人对福柯及其理论的研究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已经引发热潮，近些年来更是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其中知名度比较高的有美国学者詹姆斯·米勒、伊·库兹韦尔、布莱恩·雷诺等；英国学者路易斯·麦克尼等；德国学者马文·克拉达以及以吉尔·德勒兹为代表的法国哲学家们，他们都在各自的著作中解读了或者谈到了福柯的理论。而直接提到福柯话语理论的著作更是不胜枚举，比如伊·库兹韦尔在其代表作《结构主义时代——从莱维·斯特劳斯到福柯》中论述道：“语言在它原来的形

^①刘北成. 福柯思想肖像[M].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第 57 页.

式中，当上帝亲自给予人们的时候，是清楚的，因为它以符号为基础。但是当语言变成了个别语言，而且采纳了许多新意义和符号功能时，这种符号的清楚明白的性质就被破坏了。”^①这段话从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福柯对语言的看法，指出最初以“相似性”为原则的语言会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布莱恩·雷诺也曾在其代表作《福柯十讲》中提到：“福柯发展了海德格尔关于‘语言乃存在之家，人以语言为家’的思想。”^②与此同时，福柯思想的重要研究者、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也在《德勒兹论福柯》这部著作中多次论述到福柯的话语观。此外，英国学者路易斯·麦克尼的代表作《福柯》、美国学者詹姆斯·米勒的《福柯的生死爱欲》、德国学者马文·克拉达的《福柯的迷宫》等著作都直接或者间接地阐述了福柯的话语理论，这些研究成果无疑给国内研究福柯的人士提供了很大的借鉴作用，甚至很多国内的研究者就是以西方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从而不断的深入、创新。

就国内而言，近些年来，随着福柯多部著作的引进，引发了讨论福柯的热潮，越来越多的学者、研究人员开始了解福柯、理解福柯。国内知名的研究者有《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的翻译者、复旦大学教授莫伟民；《福柯的界限》、《福柯的面孔》、《福柯读本》的作者汪民安；《福柯思想肖像》作者刘北成；《福柯》的作者王治河以及《福柯的生存美学》的作者高宣扬等。除此之外，国内近些年也出版了很多研究福柯的著作，比如包亚明的《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陆扬的《后现代性的文本阐释》、张世英、赵敦华的《福柯》以及吴猛、和新风的《文化权力的终结：与福柯对话》和刘永谋的《福柯的主体解构之旅》等。这些著作都对福柯及其思想作了很好的阐述和分析，给关注福柯的人们提供了很好的资源。但以上这些著作研究了福柯思想的各个方面，对于福柯话语理论的论述和解读只是其中之一，而且大家多从“话语”本身的角度去研究，阐述了福柯话语理论的内涵和作用等。而本文则另辟蹊径，结合福柯的著作《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一书，从“词”与“物”关系的角度去解读福柯的话语理论，这种解读方法不仅包括对福柯话语理论渊源的梳理，还包括对福柯话语理论之所以产生的历史

^①伊·库兹韦尔. 结构主义时代——从莱维·斯特劳斯到福柯[M].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年. 第207页.

^②布莱恩·雷诺. 福柯十讲[M].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4年. 第56页.

背景的分析。结合福柯提出的四种知识类型来谈他的话语理论，并分析福柯所说的“词”与“物”在当今时代的关系走向以及这种走向会对当今时代的“话语”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是本文的写作目的，也是对更好的解读福柯话语理论的一种希望和期待。

第一章 “词”与“物”关系的理论梳理

第一节 理论渊源

“词”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不仅包括文字、语言，还包括线条、色彩、肢体、音符等多个含义。梳理“词”与“物”的对应关系，我们从文字入手。文字是文化的代表，探讨文字的起源对于研究中西方文化如何认识“词”与“物”的关系意义重大。

一、西方对“词”与“物”关系的历史理解

世界上大多数文字在被创造之时都追求着与事物的对应，首先以西方文字为例。西方文字又被称为“拼音文字”或者“字母文字”，这是目前对西方文字比较通行的称谓。从文字体系来看，西方文字属于“借源文字”，顾名思义，“借源文字”就是以他者为参考，在借用的基础上经过后期的再创造而形成的。“公元前一千多年腓尼基人借鉴埃及圣书创造了字母，希腊人又对其进行改造，诸如添加元音字母，改变书写方向，改变字母形体等，公元前11世纪到4世纪中叶逐步形成了希腊字母；随后从希腊字母的母体中诞生了斯拉夫字母、拉丁字母等，形成了今天的英文、法文、德文、俄文等文字体系。”^①

从西方文字体系看，以英语体系为例，最初的造字遵循着“词”与“物”的对应原则，虽然这种字母文字结构简单，但也表达出象形的意义，无论是最初的腓尼基字母，还是如今的拉丁字母等，都可以看出“词”与“物”统一的痕迹，“据西方文字学家们考证，字母最初也是象形的，如“A”起源于埃及圣书字表示牛头，“Z”表示道路，“M”表示山，“S”表示蛇和女人体形，等等，只是后来经过不断借用和改造丧失了最初的象形性。”^②由此可见，西方人在造字之初是遵循“词”与“物”的对应关系的，但由于生活环境、时代背景等的不同，如今的西方文字呈

^①陈莉莉、张发祥. 从文字比较看中西方文化差异[J]. 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3).

^②陈莉莉、张发祥. 从文字比较看中西方文化差异[J]. 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3).

现出抽象性高于形象性的特点。这一转变的原因，我们可以从生活环境的角度进行考察。最初创造字母的腓尼基人与改造字母的希腊人，他们多以海上生活为生，这种生活方式区别于中国的以农业为生，海上生活使人们的头脑变得更加聪慧、敏锐，因此更善于推理与演算，逻辑思维和抽象思维同时得到锻炼与强化，表现在文字上便是要求简约、易于书写，而符号化正是其显著特征，和横平竖直的中国汉字比起来，西方文字，比如英语，在书写上的确简约了许多，但象形特征却由此减弱。“词”与“物”的对应关系不再像造字之初那样明显，绝大多数文字甚至无法与事物的形象联系起来。

西方文字更多的是对语音的记录，以表情达意为目标，对文字本身的研究并不被西方人所重视，比如表示“女人”含义的英语单词为 woman，单从词形看，我们找不到与女人外形相近的地方，象形性全无，但从这个单词的构词法来看，它是由 human(人，人类)、female(女性的)和 adult(成年人)这三个单词经过删减重组而成的，可见在表情达意上做到了对事物的确切描述。类似的单词，不胜枚举，我们通常将这种构词法叫做词缀构词法，是英语中最常见的构词法之一。虽然词缀构词法能够在表情达意上使得文字和事物联系起来，但是“词”与“物”的统一性已变得不再明显。

经过以上分析可知，西方文字与事物的关系从最初的外型上的形象发展到今天的抽象，“词”与“物”的统一性被打破。而东方文字与事物关系的发展状况却与西方存在着不同。

二、东方对“词”与“物”关系的历史理解

东方文字，以汉字为例，在创造之初和西方文字一样模拟着事物的特征，与西方文字不同的是，这种“词”与“物”的统一关系并没有随着文字的发展和演变被彻底打破，它始终是汉字的基础，这一统一原则对汉字的影响非常深远。中国的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自源文字”之一，“自源文字”即不以其他的文字体系为基础，靠自身的发展、演变而形成的文字。史料记载，中国的汉字是在图画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早期的图画摹仿自然万物，用以记事、传情，而古老的汉

字和图画有相近之处。“虽然文字学界至今对文字来源的看法尚未取得统一的认识,然而绝大多数当代文字学者,都不否认原始图画是文字的主要渊源。”^①也有的学者很肯定的说道:“人类最早的文字都是从记事图画演变而成的,这种文字都是根据客观事物的形状和特色创造而成的。”^②可见文字和图画的确有着不解之缘。

众所周知,汉字的发展演变经历了古文字和今文字两个阶段。最早的古文字是甲骨文,它也是最早的汉字形式。甲骨文中的很大一部分文字是以实物为基础的,比如甲骨文的“鸟”字便类似于一只鸟的形状,可见是从图画上的鸟发展而来。到了大篆的“鸟”字,便和繁体字“鳥”接近了,但仍可看出图画上鸟的神韵;又如甲骨文的“日”字,是一个圆圈里面加个点,就像太阳的形状,但由于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上,圆形刻画起来不方便,因此才写成了方形;同样,“月”字在甲骨文中也和自然界中的月亮的形状极为相似,它是一个半圆形,里面加了一画,也是为了刻画的方便,把它写成了方形,只是下边没有封口,用以和“日”字相区分;而“山”字也一样遵守形似的原则,“山”为“象山峰并起之形”,这是我国五代宋初时期曾为《说文解字》作注的训诂学家徐锴的解释。从汉字的造字法来看,以上的文字被称为象形字,即用象形的方法造出的汉字,是一种通过摹仿事物的外形而创造文字的造字法。象形字无疑遵循着“词”与“物”统一的原则,那么其他几种造字法是否也是如此呢,答案当然不是。单从指事字、会意字、形声字、转注字、假借字等造字法的定义就可以找出答案,比如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会意”是“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用现代汉语定义的会意字是“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独体字根据意义之间的关系合成一个字,综合表示这些构字成分合成的意义,”^③用这种方法造出的字是会意字;指事字是“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现代汉语定义指事字为:“一种抽象的造字方法,也就是当没有、或不方便用具体形象画出来时,就用一种抽象的符号来表示。”^④由此可见,除象形字以外的几种造字法并没有以自然界

^①王元鹿. 普通文字学[M].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6 年. 第 71 页.

^②刘又辛. 汉语汉字答问[M]. 商务印书馆, 1999 年. 第 65 页.

^③黄伯荣等. 现代汉语.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1 年. 第 54 页.

^④黄伯荣等. 现代汉语.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1 年. 第 55 页.

的事物为依托，但象形字是构成汉字的基础，“我们说象形是基本原则，是因为会意和形声在多数情况下也都是以象形为基础的。所谓会意字，常常是两个象形字的结合……形声字也可以是两个象形字的结合，不过其中一个象形字不取其义，只取其声，用为表音的成分罢了……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上古汉字基本上是一种象形文字。”^①象形字在汉字中所占比率并不高，但却拥有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其中缘由不得不提到我们常说的“摹仿说”了。

“摹仿说”最早起源于西方，通常用于谈论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此学说最早由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提出，他说：“艺术显然是由于摹仿自然”。除赫拉克利特之外，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都认为文学与现实有着某种对应关系，比如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出“摹仿是人的天性”。由于西方文学最早是叙事文学，所以“摹仿说”比较发达，而中国文学最早的文学样式属于抒情文学，所以“摹仿说”不够发达，中国古代没有明确提出过“摹仿说”，但却有这种思想，比如，《周易·系辞》中说道：“观物取象”；《吕氏春秋·古乐》：“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荆浩提出“度物象而取其真”；王履认为：“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等等。由此可见，我们的先人也认识到了摹仿的重要性，只是没有像西方人一样明确提出“摹仿”这一学说。西方的“摹仿说”更多是对文学与现实关系的探讨，而广义的摹仿不仅限于文学或艺术领域，早期社会被创造出来的、尚且称不上文明、只是古人为了便于生存的文字就是摹仿现实存在物的产物。

如上所述，我们的祖先在造字之初是摹仿自然的存在物，追求着文字与自然世界的形似，故而最早的汉字由图画发展而来不足为奇。图画在摹仿自然方面的确高于文字，但在表情达意上却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先人为了满足社会发展和自身进步的需要，取图画高摹仿性之特征，以便于刻画、记载为原则，又以充分表情达意为目的，创造了历经五千年而仍旧大放异彩的中华汉字，虽然如今的汉字很多已看不出象形的特征，汉字已由最初的表形走向表意，但对自然的摹仿始终都是汉字产生的基础，摹仿对于汉字这一伟大文明成果意义重大。想了解汉字

^①王力. 古代汉语[M]. 中华书局, 1998年. 第163页.

的起源，摹仿这个环节是无法绕过的，“词”与“物”的统一关系在早期社会也就是这样被建立起来的。

纵观“词”与“物”的理论渊源，我们可以得知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人们就已经开始遵守着“词”与“物”的统一，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十九世纪以前。十九世纪，很多学者、文学家、文艺理论家等开始打破“词”与“物”统一的规则，并力图颠覆两者的关系，福柯便是其中之一。福柯通过对西方文化四种知识类型中“词”与“物”关系的分析，得出进入十九世纪以来的现代知识型中，“词的秩序已不再表示真实的事物，而是表现人对物的表现”的结论。福柯通过对“词”与“物”统一关系的颠覆传达出了他的话语观，在他看来话语不再是人们交流的工具、不再是传播知识的手段，它已成为一种主导力量，是事物的本源。当然，福柯独特的话语理论并不是这个时代的偶然产物，它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诞生的，了解这一时期的历史背景不仅对于解读福柯的话语理论意义重大，而且会让我们知道对于“词”与“物”统一关系的颠覆，绝不仅仅福柯一人，甚至可以说是这个时代的共同声音。

三、强调“词”与“物”对应关系探源

如前所述，“词”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不仅包括语言、文字，还包括线条、色彩、音符等。经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已经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无论是西方社会还是东方社会，人们在造字之初都追求着与自然事物的统一。其实，不仅是文字，人们在发明语言、音乐、舞蹈、绘画等时也同样如此，毋庸置疑，人类发出的第一个可以称得上语言的声音绝对不会讲究语法的精确、发音的优美，可能只是一个声音，提醒他的同伴远离危险或者发现了食物，这是由人的第一本能即生存本能决定的，此时的人类或许并不比老虎等动物高级，他们生活于自然之中，自然事物的影响无处不在，听到了虫鸣鸟叫他们学会了说话和歌唱，看到了动物奔跑或者走路的姿势他们学会了舞蹈，见到了大自然中的树木花草、河流山川学会了绘画，正如德谟克利特所说：“在许多重要事情上，我们是摹仿禽兽，作禽兽的小学生的。从蜘蛛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学会了造房子，从天鹅和

黄莺等歌唱得鸟学会了唱歌。”^①无疑，自然事物为人类提供了现实的摹本，所以才有了今天辉煌灿烂的艺术世界。

此时，有人会质疑，为什么人们自远古时期就追求着“词”与“物”的统一呢？这算得上是人的一种本能吗？如果是本能，那我们该如何去解释它呢？这些问题我们可以从哲学、心理学等角度进行探讨，以期找到合理的答案。

（一）从哲学的角度看

思维与存在具有同一性，这是多数西方哲学家的共同看法。关于两者同一性的问题最早由古希腊哲学家巴曼尼德提出，他认为：“可以被思想的东西和思想的目标是同一的，因为你找不到一个思想是没有它所表达的存在物的。”^②巴曼尼德很好的解释了思维存在的合理性，它是为“存在”而存在，没有“存在”的思维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任何思维所要表达出的思想都会有相应的存在物 and 它对应，两者是同一的。在巴曼尼德提出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之后，又有很多哲学家探讨了这一问题，有人支持巴曼尼德的观点，也有人提出了质疑和批判，比如古希腊哲学家高尔吉亚，他认为“无物存在”、即使存在“人也无法认识”、“即使可以认识它，也无法把它告诉别人”，可见，高尔吉亚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提出了否定。但是，事实上，西方绝大多数哲学家都认可巴曼尼德的观点，随着讨论的深入开展，“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到了近代渐渐成为了“哲学的基本问题”，而到了德国古典哲学家们的世界里，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发展成了“贯穿于每一学说之中和各个学说之间的一根主线”并且获得“它完全的意义。”

首先，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发表了对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看法。康德认为人的思想不能完全认识客观存在，“他在观念与‘自在之物’之间划上了不可逾越的鸿沟，认为‘自在之物’处于知识所不能达到的‘彼岸世界’。人只能认识现象，现象背后的本质则是不可知的。”^③从这个角度看，康德是否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然而，他又说：“理智的（先天）法则不是理智从自然界得来的，而是理智

^①德谟克利特.著作残编[A].引自西方文论选[C].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第4页.

^②张健鹏.西方思想经典名著导读[C].中国妇女出版社,2009年.第57页.

^③刘亚政.浅议大陆唯理论对思维与存在统一性的认识和理解[J].长白学刊,1988(2).

给自然界规定的。”^①这也就是康德所说的“人为自然界立法”，这一观点又从唯心主义的角度肯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除了康德之外，谢林等哲学家又从各自的角度阐明了他们对思维与存在关系的看法。比如谢林从客观唯心主义出发肯定了两者的同一性，并“主张用一个自我与非我、主体与客体的‘绝对同一’作为思维与存在统一的基础。”^②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是探讨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集大成者”，他不仅对康德等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提出批判，而且还提出“绝对理念是单一的东西分裂为二的过程或树立对立面的双重化过程，”^③他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由“绝对理念”制造出来的，因为“思想不仅是我们的思想，同时又是事物的自身，或对象性的东西的本质。”^④由此可见，“在德国古典哲学那里，思维与存在统一性已经成了他们自觉专门地进行探讨的问题，成为他们的哲学体系的出发点和归宿，实现了思维与存在的辩证统一，”^⑤为后人提供了“哲学探讨的中心。”除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之外，人们之所以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视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因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人类实际生活中的基本问题，它普遍存在于人类的实际生活并决定着人们思想和行动的出发点和方向。”^⑥由此可见，我们的祖先包括现代人怎么做事、怎么行动，是两者的关系影响着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关系以及物质第一性的特征决定了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以自然事物为基础，因为现实中的事物不仅给我们提供了摹仿的对象，而且也给我们的精神带来启发，于是人们以第一性的物质即自然和社会中的事物为基础来创造新事物也就顺理成章了。

了解了思维与存在即物质与意识的统一关系后，我们有必要知道这种统一关系对“词”与“物”的统一关系究竟起到怎样的影响。毋庸置疑，“词”是人类的精神产物，这种精神产物是以“物”为基础，通过摹仿“物”的形象而产生，精神不会凭空产生“词”，它需要外界的启发，而“物”恰恰就是这个启发的来源，

^①康德著.未来形而上学导论[M].李秋零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第 93 页.

^②刘亚政.浅议大陆唯理论对思维与存在统一性的认识和理解[J].长白学刊.1988 (2) .

^③黑格尔著.小逻辑[M].贺麟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第 120 页.

^④黑格尔著.小逻辑[M].贺麟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第 120 页.

^⑤黑格尔著.小逻辑[M].贺麟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第 120 页.

^⑥沈湘平. 韩毅.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M].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年. 第 1 页.

因为“物”是一种客观实在，它的形象及特征为摹仿提供了现实的素材。自然中的万事万物并不是以人的精神为依托而存在，人们正是通过对“物”的摹仿，才有了语言、文字、音乐、绘画等“词”的产生。更进一步说，在早期社会，摹仿是人们更好的生存的唯一途径，为了求得长久的生存和更好的发展，他们只能通过摹仿来遵守着“词”与“物”的统一。

另外，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看，人的认识可以反映客观实在。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在马克思之前，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家们，他们都对认识论有自己的见解。以康德和黑格尔为例。康德提出“物自体”这一概念，他认为人的思维和“物自体”是分离的，他用了一个比喻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我的财产状况中，现实的一百塔勒比一百塔勒的单纯概念有更多的东西。因为对象在现实性方面并不是分析地包含在我的概念中，而是综合地添加在我的概念之上，而通过在我的概念之外的这个存在，丝毫也没有对这被想到的一百塔勒本身有什么增多。”^①从这个比喻中，我们可以看出康德否定了人的思维的认识能力，认为人不可能完全认识世界，这就走向了“不可知论”。黑格尔批判了康德的认识论，他说：“理解存在、把存在设定为概念，正是康德所并未达到的。存在在他那里仍然是完全外在于概念的东西，但我们却认为存在是概念的外在化。在存在中和概念中，内容是同一的。存在既然不包含在概念里，那么从概念推存在的努力也是徒劳的”。^②由此可以看出，黑格尔反对把思维与存在分离开来，他认为认识应该是一种实践的过程，这是当时具有突破性的观点，但由于黑格尔的思想都是在他“绝对理念”理论的支撑下，所以脱离了物质世界，他的认识论便具有了唯心主义的特点，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认识论还有着很大的区别。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将认识的主体与客体都进行了改造。马克思认为人作为认识的主体并不是仅仅用理性去思考一切，除了理性之外，还有非理性的东西影响着人的行动，因为人是社会发展的产物，生活在不同时期的人们会受到相应时代种种因素的限制和影响。同时，在马克思看来，认识的客体也不是亘古不变

^①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第 67 页.

^②黑格尔.哲学史演讲录(第四卷)[M].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 1978 年.第 98 页.

的事物，它会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周围的感性世界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在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①由于马克思主义对认识主体与客体的不同认识，人们开始把这一认识论称为实践的认识论，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不是用来论述现实，而是用来改造现实。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人的认识可以反映客观实在出发，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认识世界是人的一种能力，由于人有这种认识客观实在的能力，所以才不断通过实践去证明自己，在实践的过程中追求“词”与“物”的统一恰恰是对认识能力的肯定，因为创造出来的新鲜事物符合自然事物的特征说明人的确有这种认识能力并且在认识的前提下还有继续创造的能力，现实事物是人类判断所创造的新事物成功与否的标准。换句话说，为了不断的证明人类确实能够认识客观实在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创造力，所以人们才追求着“词”与“物”的统一。

（二）从心理学的角度看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先人们追求“词”与“物”的统一是在那个历史阶段的必然行为。

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提出人能通过摹仿得到“快感”，人通过文艺摹仿这种求知活动来获得精神上的快乐，缓解繁重的体力劳动带来的压力。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这种能带来快感的摹仿就是一种心理上的摹仿，“心理摹仿也可以称为内在的摹仿，即通过人的感官接受外界事物刺激而形成一种对外界事物近似的反映，在摹仿中会获得一种快感和满足感。”^②心理摹仿没有理性因素的参与，只是凭借着人的直观感受而产生的好与坏、美与丑的情感。以古希腊哲学家的观点为基础，后人又从多个角度直接或者间接地探讨了人们遵从“词”与“物”统一的原因。古鲁斯就是其中之一。古鲁斯明确提出“内幕仿”的概念，他认为人在

^①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20页.

^②李健夫.美学思想发展主流[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33页.

接触到外界事物时，会有一种“内摹仿”的冲动，如同看到自己喜欢的运动时，身体就会产生随之而动的力量一样。“内摹仿”通过人的感官而实现，并没有理性因素的参与，因此有人把这种作用称为“无意识内摹仿”。从心理学上说，“无意识内摹仿”对意识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甚至能决定意识的思考方向，因为意识本身就是建立在感官的基础之上的，只是它具有明确的目的性，从而能从无意识所感知到的感官对象中获得有价值的信息，从而淡化主观性，突出选择性。据科学家考证，“无意识内摹仿”会对儿童的意识产生很大的影响。一个刚刚出生几个月的婴儿会对母亲的动作进行摹仿，这是人的一种本能。婴儿对父母亲动作、表情的摹仿能力是先天遗传而来的，作为“无意识内摹仿”的外在表现呈现出来，人的这种进化的本能和动物相似，也就是说“无意识内摹仿”不仅限于人，在动物中也存在。人们生活中常见的鹦鹉学舌、黑猩猩摹仿人的动作、表情等都是属于“无意识内摹仿”。就连动物本身信息的传递，也有着“无意识内摹仿”的印记，比如动物面临危险或者发现猎物时发出的各种声音，这种信息的传递就是通过延续的摹仿实现的，我们也可以把这种声音称为动物的“语言”，声音一经发出就和现实中的事物产生了对应，亦或进攻、亦或逃跑，“词”与“物”实现了统一。动物的进化尚且如此，人类的成长更是一个“无意识”的过程，通过不断的摹仿完成了人类的进化历程。对于人类摹仿本能的心理学解释，心理学家更有见地。

美国心理学家加德纳把人的成长分为五个阶段，其中在儿童时期有一阶段可以称为写实主义高峰期，在这个阶段，他们判断事物的唯一标准就是是否真实，是否符合客观事实。这个理论不仅适用于文学观念的发展，同样也适用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发明语言、文字的时间尚早，可以说是在人类的儿童时期就已初步定型。以中国的汉字为例，汉字的产生是有据可查的，中国最早的汉字甲骨文形成于公元前 14 世纪，汉字真正走向规范化是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经过对汉字的简化和整理使其逐步走向正规。我们通常将秦以前的时期称为先秦时代，是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也可以称为儿童阶段，写实主义是这个阶段的特征，因此通过摹仿的形式来追求“词”与“物”的统一也就不足为怪了，换句话说，如果此时人类发明的“词”没有和现实中的“物”统一，那么他们一定认为这是不

真实的，在心理上是接受不了的，而不像今天，社会已发展到“不再信守一个标准”（加德纳）的阶段乃至更高的时期，人们可以接受许多闻所未闻的新鲜事物，和今天相比，古代时期的确是人类的儿童时期。

此外，就“摹仿”而言，也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去解释。“摹仿，英文为 Imitation 或 Copy，这两个词带有很强的心理学色彩。前者强调摹拟，指个体感知别的动物或人的动作，并用物质的或观念的形式从事仿真；后者强调复制，即把对象不走样地再现出来。经拉丁文 Imitary 的中介，摹仿可以被追踪到希腊文 Mimesis，此词有摹拟、仿造、映象、代表等义项。显然，摹拟、仿造与英文 Imitation 和 Copy 相类，其中突出了主体与对象的关系；而映象（Idea，明显来自柏拉图）、代表（Representation）似有不同。”^①此处，提到了“主体与对象的关系”，也即人与事物的关系，其实，真正提出摹仿的主体问题的是西方哲学家德谟克利特。德谟克利特在论述摹仿的主体问题时强调人类心理的主动性，也就是说人在主观上也即心灵上会遵守着与客观世界相符合的原则，所以才使摹仿成为可能，反之，如果这种主观与客观相符合的原则不存在，那么人们就无法认识外部的世界，更不可能以外界事物为基础进行摹仿，从而创造出如此众多的新鲜事物。既然人在主观上就有追求与外界事物相符合的特征，那么在创造“词”时同样会遵守与“物”的统一。这是人们追求“词”与“物”统一原则的心理学解释。

第二节 颠覆“词”与“物”对应关系的历史背景

十九世纪以来，人们对“词”与“物”关系的认识有了明显的变化，他们不再信守着“词”与“物”统一的原则，而是渐渐地开始颠覆两者的关系。到了二十世纪，人们对“词”与“物”的关系进行了彻底的颠覆，尤其在西方，人们不仅对自古代社会就遵守的“摹仿说”进行否定，而且还提出了对真理的怀疑。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兴起于 20 世纪上半期的现代主义思潮。现代主义强调“词”与“物”的不对应，这无疑给“词”与“物”的统一原则带来巨大的冲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这种持续了几千年的和谐关系。福柯的话语理论就是在这种全面颠覆

^①李珣平.寻绎摹仿说在古希腊起承转合的哲学轨迹[J].外国文学评论，1999(4).

西方文化的背景下进行的。

一、否定“摹仿说”及传统真理观

“摹仿说”的统治地位在西方文化史上持续两千年之久，到了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浪漫主义思潮兴起，“摹仿说”的地位开始动摇。浪漫主义者提倡用人的心灵来创作，艺术的本质不在于摹仿，而在于艺术家的内心情感。除了浪漫主义思潮对传统的“摹仿说”提出否定外，康德也曾经利用他的“天才说”对其进行批判。康德认为机械的摹仿是没有意义的，这不是人的内心情感的真实流露，正如人去摹仿夜莺的歌声，无论怎样相似、逼真也毫无趣味。康德提倡“艺术天才论”，他认为真正的艺术来源于天才的创造，而天才的创作是独一无二的，不需要摹仿的参与。康德虽然没有直接对“摹仿说”提出否定，但是却对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产生了重要影响。黑格尔是用他“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观点彻底否定了传统的“摹仿说”。在黑格尔的代表著作《美学》第一卷中黑格尔提出单纯的复制世界是一种游戏，而不是真正的艺术：“这种多余的费力也可以看成一种冒昧的游戏，因为它总是要落在自然后面。”^①无论摹仿自然到多么逼真的程度，人的摹仿在自然面前永远是力不从心的，用黑格尔的话说就是：“靠单纯的摹仿，艺术总不能和自然竞争，它和自然竞争，那就像一只小虫爬着去追大象。”^②黑格尔对传统“摹仿说”进行批判并提出自己的新观点，是为了向人们说明艺术是人类心灵的表现。继黑格尔之后，美国当代文论家艾布拉姆斯在其知名著作《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中再次提出对传统“摹仿说”的否定。他说：“镜子无论是朝向诗人还是朝向外部世界，都只能从单一的方向来反映所呈现的事物，哈兹里特在镜子之外又加上了灯，使这一比方的寓意更加丰富，从而表明，诗人所反映的世界，业已沐浴在他自己所放射出的情感光芒之中。”^③进入 19 世纪之后，人们的思想更加的解放，传统的“摹仿说”就受到更多的批判，颠覆“词”与“物”的统一关系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出现的。

^①黑格尔. 美学（第 1 卷）[M]. 朱光潜译. 商务印书馆, 1979 年. 第 53 页.

^②黑格尔. 美学（第 1 卷）[M]. 朱光潜译. 商务印书馆, 1979 年. 第 54 页.

^③艾布拉姆斯. 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M]. 郇稚牛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年. 第 75 页.

解读颠覆“词”与“物”统一关系理论的时代背景，我们还可以从哲学问题——真理入手。研究哲学，绕不开真理这一概念。真理问题是一个自古有之的话题，赫拉克利特就曾说过：“思想是最大的优点，智慧在于说出真理。”^①亚里士多德也曾对真理问题发表看法：“每一事物之真理与各事物之实是必相符合。”^②不难看出，亚里士多德对于真理的认识属于传统的真理观，强调符合论，也就是人的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符合论的真理观就是在亚里士多德之后产生的，真理逐步演变为“知与物的肖似”。同时，海德格尔还就真理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理论，他提出一种存在的真理，认为真理并不在于主客观的符合，而在于对存在的显现、揭示和澄明，使存在处于一种“无遮蔽状态”，他说：“真理是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无遮蔽状态。”

总之，无论是传统的符合论真理观还是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存在真理观都强调了真理的重要性，他们的讨论都是建立在真理确实存在的基础上，而到了十九、二十世纪，人们却对真理这一概念提出了挑战，甚至不再相信真理的存在。尼采曾提出重估一切价值，他对理性、对现代文化都进行了批判，他批判的锋芒指向“旧有的一切偶像（真理）”，^③尼采的理论对后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福柯就是其中之一。福柯在《尼采·谱系学与历史》中说道：“（事物的本质是）被完全陌生的东西零零碎碎地塑造出来的。”从这一观点可以看出福柯对事物的本质即真理持拒绝与否定的态度，在福柯看来，“真理无疑是一种权利”，因为真理“激发了尊敬和恐惧，由于它支配了一切，故一切必须服从它，它是掌握权力的人们根据必须的礼仪说出的话语；它是提供正义的话语。”^④福柯所说的真理并不是作为谬论的对立面而存在，什么是真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为什么要去寻找真理，他的回答是权力的作用。真理是能够支配权力的话语，只要获得了话语权，就拥有了创建真理的权力。由此可见，福柯不相信绝对真理的存在，真理的得来取决于谁掌控着话语权。

^①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M]. 商务印书馆, 1999年. 第25页.

^②亚里士多德. 形而上学[M]. 吴寿彭译. 商务印书馆, 1997年. 第34页.

^③王岳川. 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诗学[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 第41页.

^④福柯. 尼采·谱系学与历史[M]. 选自福柯集[C]. 杜小真编.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3年. 第146页.

十九世纪中后期到二十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有了不同的以往的新变化，科学对人类的影响要比历史上任何一次变革都更巨大、更深刻，人们开始用新的思维方式看待世界，传统的真、善、美观念在科学的洪流下被彻底动摇，人们对很多传统的观念都产生了怀疑，认为没有绝对的真理存在。福柯对真理的分析就是鲜明的例子。其实，福柯所说的真理，已和传统的真理概念相去甚远，和福柯一样，二十世纪的很多学者、知识分子等都已对传统的真理提出否定或者另类的解释，他们对于真理的挑战动摇了理性主义文化的根基，这样西方社会坚守了数千年的理性主义文化被现代的非理性主义文化抢夺了优势，颠覆“词”与“物”统一关系的理论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不再信守真理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

二、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性

现代主义思潮的出现，在全世界的范围内产生广泛影响，关于这一思潮产生的年代，大体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现代主义从 1900 年开始，另一种说法是从尼采、叔本华开始。而我们常听到的现代主义文学诞生于 19 世纪 30 年代，波德莱尔被誉为现代派的鼻祖。到了 20 世纪，现代主义思潮发展到了高潮阶段，为了加以区分，很多学者将 20 世纪的现代主义称为后现代主义，也有人将以波德莱尔为代表的现代主义称为早期现代主义，而将 20 世纪出现的后现代主义称为现代主义。20 世纪的现代主义继承了早期反传统的特点，对传统的“摹仿说”提出挑战，在 19 世纪以前，“摹仿说”深深影响着欧洲的文学艺术，人们在创作时强调真实的再现客观世界，可以说是很自然的追求着“词”与“物”关系的统一。“十九世纪后期，一些作家开始感觉到，以往的文学，尤其是现实主义文学，在模仿自然理论的指导下过于强调再现外部客观世界……于是，他们开始反其道而行之，抛弃传统文学对客观外在真实的刻意追求，转而重视对主观内心世界的真实展示。20 世纪现代主义文学则基本上倾向于表现一种超现实的真实……具有明显的反传统特征。”^①由此可见，现代派尤其是后现代主义通过对“摹仿说”的否定，颠

^①郑克鲁. 外国文学史(下册) [M].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5 年. 第 100 页.

覆了“词”与“物”的统一关系，“超现实的真实”就超越了物的范围，从而使“词”的表现空间大于“物”，两者的统一原则被打破。

现代主义的反传统不仅表现在文学上对摹仿说的挑战，而且具有“消解深度模式、消除历史意识、销蚀主体精神、消除审美距离”的特征。一切都是平面化，斩断了与传统的联系。与此同时，还从文艺理论、语言学、绘画等多个领域颠覆“词”与“物”的统一关系。可以说，“颠覆”二字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主题。

如果把 20 世纪的西方文化比喻为一部交响乐的话，那么对于传统“词”与“物”统一关系的颠覆就是这部交响乐中一个响亮的音符。作为这个时代的一个声音，此时的文学家、文艺理论家等在创作上难免受到它的影响，有的人甚至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和观点，来捍卫自己欲摆脱传统理论束缚的立场。他们当中有的人通过提出具体的理论来颠覆传统，比如德里达提出解构理论；有的人则通过创作内容和形式都很怪诞的文学作品来颠覆传统，比如波德莱尔的《恶之花》、萨特的《墙》、《苍蝇》、贝克特的《等待戈多》等等。而自从索绪尔发表了《普通语言学教程》，提出语言中“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后，语言便成为这个时代以至于延续到至今被关注的对象，比如很多现代派文学的作家便把语言作为颠覆传统文学的媒介和手段，借助于夸张、荒诞的语言甚至是语无伦次等形式上的创新，来达到颠覆传统的目的。而在哲学、文艺学领域，语言与人、与事物的关系也成为了大家热烈讨论的话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法，福柯颠覆词与物统一关系的理论就是其中之一，这个理论颠覆了人和语言的关系，代表着福柯的话语观。而福柯颠覆传统的理论并非是一家之言，和他持类似观点的人还有很多，德里达就是其中之一。

德里达，解构主义的创始人，他的解构理论和福柯的话语观是在同样的历史环境下产生的，在批判传统方面有着同样的冲击力。德里达的解构理论批判了西方哲学坚守了几千年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所谓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与“语音中心主义”相近，“逻各斯”的本义就是指语言，人们认为通过语言可以揭示世界的真实性，现有的言论无论被翻译成多少种语言，在揭示真理方面的原有之义不会被改变。与此同时，“逻各斯中心主义”认为这个世界永远存在着二元对立，

就像有了真理，就一定要有谬误相对应；有了理智，就一定要有情感的存在，也只有这样，才符合传统的哲学观念。德里达对此提出批判，他认为这种二元对立的等级模式是人为区分的，不符合事实，有些东西不能说非此即彼，这种说法过于绝对。与此同时，德里达认为没有所谓的“中心”的存在，以任何概念为中心都是不正确的。德里达解构了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的关于“能指”与“所指”的理论，索绪尔认为任何“能指”都会有“所指”之物相对应，这种关系是固定不变的，但同时又提出“漂浮的能指”一说，即“能指”与所指之物的关系又因不同的环境比如国度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德里达认为索绪尔的这种理论本身就解构了“能指”与“所指”之说，既然“能指”与“所指”会因环境的不同而有差异，那么就不能说任何一种“能指”都会有固定的所指之物。言论或著作在被翻译或外传的过程中一定会产生意义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受多种因素影响，比如种族、时代、环境、性别等都会造成意义的差异。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对西方传统哲学的批判动摇了人们二元对立的传统思维方式，同时对西方持续了几千年的非此即彼、带有强制性和压迫性的二元对立等级秩序也进行了彻底的颠覆。德里达解构理论本身的缺陷我们暂且不提，就此理论在批判传统文化方面所产生的冲击力而言，和福柯的话语理论确实有相近之处。

福柯认为社会上存在着一种现象——话语即权力，即权力要通过话语体现出来，只有通过话语定义的“何为某物”才能被社会认可，任何不符合这种规则的言论都要受到排挤，这无疑带有强制性的特点，福柯和德里达一样，对这种强制性提出了批判。通过二者的理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代的特征，在全面批判西方传统文化的背景下产生的理论一定会带有批判的色彩，只不过大家选取了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途径，但是殊途同归，目的只有一个，即希望通过自己的理论实现社会的平等、言论的自由。

说到福柯的话语理论，索绪尔就不得不提，他的“语言——言语”之说虽然被福柯否定，但我们却可以说福柯是在批判这种二元思维方式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理论观点的。福柯“话语”这一概念的提出间接上是受到索绪尔二分法的影响的。与此同时，索绪尔的部分语言观更是和福柯的话语观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

而颠覆性就是他们的交合点。

20 世纪瑞士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在其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了他完整的语言观，他的语言学理论属于符号学范畴，他就是在符号学的视角下阐发他的语言理论的。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了四组二元对立的概念，“能指”与“所指”就是其中一对，这组概念的提出不仅对语言学领域做出巨大贡献，而且对于文艺学、哲学等学科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与索绪尔同期乃至后期的很多哲学家、文艺理论家都受到此理论的启发，有的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语言观点，有的则在批判此理论的基础上得出新的话语理论，由此可见索绪尔“能指”与“所指”概念的影响力之深、之广。

从“能指”和“所指”的意义看，我们通常把“能指”理解为字词的语音，“所指”理解为指称的事物，但实际上，索绪尔“能指”与“所指”的意义并非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他把“所指”说成事物的心理表象，而不是现实中的事物，这样“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字词的语音与事物的心理表象的统一，而并非语音与事物的统一，可以说这种语言观打破了传统“词”与“物”的对应关系，他“只关心所指(概念)与能指(音响形象)之间的关系,从而把指涉物一脚踢到了门外。”^①此外，颠覆传统“词”与“物”关系的理论还可以从“反本质主义”理念和绘画等方面进行阐述。就“反本质主义”理念而言，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颠覆传统、批判“中心主义”的很好例证。所谓的“反本质主义”就是反对“本质主义”，批判的矛头指向传统的绝对的真理观和艺术本质论等。它是在后现代的环境下产生的，主张多元论、反对中心等，“反本质主义”者认为没有绝对的真理的存在，也不支持“艺术即摹仿”等观点，但是他们的批判不是对西方传统思想的全盘否定，而是坚持自由和开放，以期建立起新的理论体系。福柯的话语理论就受到“反本质主义”理论的启发和影响，可以说福柯本人就具有“反本质主义”的倾向，他在批判传统“词”与“物”对应关系的同时，又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话语理论，可谓批判与建设并存。就绘画而言，20 世纪的很多绘画作品也打破了“词”与“物”的对应关系。最有代表性的绘画就是比利时超现实主义画

^①罗兰·巴特. 符号学原理[M]. 北京三联书店, 1988 年. 第 140 页.

家玛格丽特的代表作《形象的叛逆》，福柯还曾为此写过一篇名为《这不是一只烟斗》的评论，成为福柯解读“词”与“物”关系的重要论据，下文对此将做详细论述。

第二章 福柯对“词”与“物”关系的理解

福柯的《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一书从出版到现在都受得到读者的钟爱，虽然著作本身晦涩难懂，但是其影响力之大，堪称20世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哲学力作之一。这本著作深入的探讨了西方的文化和知识类型，叙述的内容时间跨度很大，从16世纪的文艺复兴时代开始直至20世纪初，全面而又深刻、细致而又创新，对于我们了解西方知识史具有极大的帮助。而福柯在《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及其《知识考古学》、《话语的秩序》等著作中所提出的话语理论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国内外学者致力于研究福柯话语理论的为数不少，这也正是福柯及其话语理论的魅力所在。在《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一书中福柯从探讨“词”与“物”的关系入手来传达他的话语观，福柯所说的“词”与“物”也就是指语词与事物。福柯认为西方文化存在四种知识类型，每一种知识型都是不同时代的产物，具有不同的特点，最大的区别就是不同知识类型中“词”与“物”的关系不同。福柯对不同历史时期“词”与“物”关系进行分析的方法被称为考古学的研究方法，而他在代表性著作《词与物》的副标题中已明确标明他所写的是人文科学的一种考古学。福柯的考古学只关注话语，他认为西方哲学很多论题都忽略了话语，他说：“话语实在性在哲学思想中被忽略这一古老的做法，在历史进程中已呈现出许多形式”。^①实际上，福柯的话语理论正是要为“话语”取得在历史上合法地位，《词与物》重在论述话语如何形成，或者说话语形成需要的条件。而到了70年代后的著作中，福柯则明确提出了话语与社会秩序、话语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因此，梳理福柯的“词”与“物”关系理论是解读福柯话语观的基础。在《词与物》一书中，福柯通过对西方文化四种知识类型、知识型转变中各具代表性的典型形象及西方文化认识型中的两个断裂的分析阐释了不同历史时期“词”与“物”的不同关系，也正是因为“词”与“物”关系的变化才使各个时期人们对话语的理解不同。福柯的话语理论就是在他细致的梳理西方文化和知识史以及

^①米歇尔·福柯. 知识考古学[M]. 三联书店, 1998年. 第104页.

独特的剖析词与物的关系的基础上诞生的。

第一节 福柯对西方文化知识类型的解读

一、西方文化的四种知识类型

（一）16 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知识型

福柯认为 16 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知识型，“词”与“物”处于统一关系中，“相似性”是人们判断一切的标准，但因为“相似性”集符号形式和符号内容于一体，因此符号的三个要素就被“归结为一个单一的形式了。”^①但是，语言作为初始的存在来讲，是最简单的标记世界的符号，福柯把它称为：“事物上面的一个印痕，散布在世界上一个标记。”^②直到 16 世纪人们对语言的认知都是由“相似性”影响着的，甚至可以说“相似性”决定着人们如何认识语言、怎样理解知识。那么究竟什么是相似性呢？王治河先生这样下的定义：“所谓‘相似相’，是指语言与事物，即福柯所谓‘词’与‘物’的相似。它们都是由上帝创造的，因此彼此都是相似的。”^③由此可见，“相似性”就类似于我们上文所提到的摹仿，也就是“词”与“物”的统一。福柯认为有四种基本形式是与“相似性”联系在一起的，它们分别是“适合”（la convenientia）、“仿效”（l’aemulatio）、“类推”（l’analogie）和“交感”（des sympathies）。

福柯认为“世界是物的普遍‘适合’；水中鱼的数量，与陆地上由大自然或人生产的动物或物体的数量是一样的……在全部创造物中，存在物的数量与突出地包含在上帝本人中的存在物的数量是一样的……世界像一根链条一样被联系在一起了”。^④由此可见，万事万物都处于直接或者间接的“适合”中，也就直接或者间接的带有“相似性”，既然这种“相似性”无处不在，那么生活在文艺复兴这个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人们对语言的理解、认知就势必会受到“相似性”的影响，“词”

^①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M].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57页.

^②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M].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57页.

^③王治河.福柯[M].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7页.

^④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M].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25页.

与“物”就是这样得到了统一；福柯所说的第二种与“相似性”相联系的形式是“仿效”，福柯引用了阿德罗芬第在《怪物史》中提到的几个形象的例子，解释了什么是“仿效”：“从远处看，人的脸与天空相仿，恰如人的理智是上帝智慧的不完美的反映一样，同样，人的两只眼，以及它们的有限的明亮，是太阳和月亮散播在天空中的巨大的照明的反映；人的嘴是维纳斯，因为它是接吻和细说恋语的通道；人的鼻子则是朱庇特的权杖和墨丘利的神杖的缩影。”^①从以上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仿效”就是把原本无法相联或者在空间上并不相近的事物联系起来，从而体现出他们之间的“相似性”，这种“仿效”关系并不受空间位置的束缚，我们也无法说出究竟是哪种事物把“相似性”带给了另一种事物，可以说他们是彼此“仿效”。这样我们便能理解福柯所说的“仿效”是一种“契合”关系，并能在远处静止地起作用的说法了。与此同时，“仿效”并不局限于两种事物之间，它的出现固然源于两种事物的相似，但此事物也会与其他事物存在这种“仿效”关系，因此可以说“仿效”是无限的。第三种与“相似性”相联系的形式是“类推”，“类推”这一概念是广义的，它既有“合适”中联系的含义，又包括“仿效”中不受空间限制而使事物之间具有“相似性”的特点，如同福柯所说：“类推的力量是巨大的，因为它所处理的相似性并不是事物本身之间的可见的实体的相似性；它们只需是较为微妙的关系相似性。这样得到消释以后，类推就可以从同一个点拓展到无数的关系。”^②“类推”的拓展性使得所有的事物包括人都直接或者间接的具有了“相似性”；第四种“相似性”形式是“交感”，它既没有“适合”的邻近，也没有“仿效”的复制和“契合”，更没有“类推”的拓展和联系，但却能够“自由自在地在宇宙深处发挥作用。它能在瞬间穿越最广阔的空间……交感激发了世上物的运动，并且甚至能使最遥远的物相互接近。”^③可以说，“交感”的作用是微妙而又巨大的，它超越了前三种“相似性”并且支撑它们的存在，也正是由于它们的作用，才使这个世界保持同一。与此同时，“适合”、“仿效”、“类推”和“交感”还提醒人们世界是怎样复制着自己，“相似性”是怎样得以存在的。“相

^①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M].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27页.

^②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M].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29页.

^③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M].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32页.

似性”不是人们肉眼所见的存在物，而是通过记号来显现的。

福柯所说的记号就是“词”，包括语言、文字等形式。“词”作为记号，是“相似性”的一个可见形式，“词”与“物”的统一在文艺复兴时期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人们认识世界、创建知识都建立在相似的基础上，“相似性”已经成为人们判断事物的标准，甚至可以说已经成为人们的思维定势，故而对语言的认知也势必难以走出这个模式。

“相似性”这种“创建者的作用”一直持续到十六世纪末。福柯认为，西方文化发展到此阶段发生了第一次断裂，它标志着文艺复兴时代的终结与古典时代的开启。到了古典时期，同一与差异代替了“相似性”从而成为人们认识语言、理解知识的标准。透过第一次断裂，我们会发现福柯对语言的剖析是以“认识型”为基础的，也就是每个阶段的“群体共识”（文艺复兴时期的“相似性”、古典时期的“同一性与差异性”就是当时的“群体共识”）不同，语言的影响因素及语言本身的作用就不同。

（二）17 至 18 世纪古典时期知识型

进入到古典时期的知识型中，“词”与“物”不再处于统一的关系中，而是“用词的秩序再现物的秩序”。17 世纪的古典认识型：“思想不再是相似性要素运动，相似性不再是知识的形式”。^①既然“相似性”已不符合古典时代的群体共识，那么在文艺复兴时期作为“相似性”标志的符号也势必不再起着标记的作用，因此福柯论道：“符号不再是世界的标志；符号不再因牢固的和秘密的相似性或亲和性纽带而与自己所指称的东西联系起来”。^②此时，作为标记的“词”与“物”走向了分离，人们对“词”包括对语言的认识都已经摆脱了“相似性”的影响。从“相似性”到“同一性和差异性”的转变就是福柯所说的西方文化认识型两次断裂中第一次断裂的标志，从此，西方知识进入到一个新的层面，这种新的知识型由同一与差异所组成。它不仅决定着人们如何认识世界，还影响着人们对知识、对语言的创建。那么，这种同一与差异是如何影响人们对“词”这一符号的认知的呢？

^①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M].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67页.

^②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M].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77页.

福柯是这样论述的。

“在古典时代，符号不再承担使世界接近世界自身并内在于它自己的形式，而是相反，它的任务是，把世界揭露出来，把世界并置在一个无限开放的表面上，并从这个表面出发，继续进行无穷的替换（我们是在这个替换中思考符号的）。”^①符号作用的转变，是因为符号发挥其功能的条件产生了变化，上文已经提到符号在古典时期已经不再是世界的形式，但“古典思想的符号，既没有抹去距离，也没有废除时间：相反，它允许人们逐步展开它们和经历它们。正是符号使得事物变得清楚明白，并在它们自己的同一性内保存自身，解散自己或联合自己。西方理性进入了判断的时代。”^②由于同一与差异的作用，“词”在古典时代不再是复制世界的符号，因此，古典时代的语言开始变得透明起来，它不再像文艺复兴时期那样使人们清楚的看见语言确实存在着，“词”与“物”是结合在一起的。古典时代的语言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语言相比的确成为了似乎不存在的东西，但是它却实实在在的在发挥语言本身的作用，福柯把这一作用称为“表象作用”。换句话说，“表象”是语言得以存在并发挥其价值的惟一处所。如果没有“表象作用”的存在，此时的语言也就没有别的价值可言了。那么，古典时代的语言是如何发挥它的“表象作用”的？这一问题也代表着福柯对古典时期语言的看法，当然也是福柯话语观的组成部分。

透过语言的表象作用，我们看到古典时代的“词”与“物”呈现的是一种再现关系，语言与世界已经走向分离。与此同时，古典时代的认识型也由此发生了改变，“同一性”与“差异性”成为了此阶段认识型的核心，语言也因为同一与差异而拥有了自己的独立地位。正如有些研究福柯的学者所说的那样：“此时的语言尽管丧失了自己原有的根基，但却拥有了新的力量。不过这种力量不属于世界，而只属于它自己：语言在词语之间彼此保持的细小和永恒的关系（而不是词与世界之间的宏大关系）中小心翼翼地保持自己的真理。”^③虽然如此，语言在此阶段

^①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M].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82页.

^②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M].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82页.

^③吴猛、和新风.文化权利的终结——与福柯对话[M].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1页.

仍是表现世界的符号，只是“它拥有自己的独立性或‘主权’。”^①

古典时代的终结时期，西方文化认识型发生了第二次断裂，现代时期被开启。福柯认为：“第二次断裂，语言消失，同一与差异被有机结构取代，人只作为物之序中的一条裂缝而首次进入西方知识领域，人类学产生了，并且适用于人的人文科学空间也打开了。”^②

（三）19 世纪的现代知识型

进入十九世纪，现代知识型形成，“语言的古典秩序被打破。词只是就作为一个语法组织结构的组成部分而言才与表象相联系。其次，语言是人的语言。语言不再是一个能对其它表象做切割和重组的表象体系。语言的表述价值在于表明和译解讲话者的意愿。最后，语言获得了一种内在的历史。”^③

现代知识型中，“词的秩序不表示真实事物而表现人对物的认识”。这样，古典时期的语言秩序就被打破了，“有机结构”也取代了古典时期的“同一性”和“差异性”，而成为现代时期的核心构架，在它的影响下现代语言开始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语言与事物的关系不再以“表象”为依据，组织结构开始发挥功能，成为一种语言和其它语言加以区别的依据。每一种语言都是一个独立的组织结构，根据自身独有的特点而与其它语言相区分；另外，福柯还认为进入到 19 世纪，“语言开始自身反省，获得了自身的深度，展开了只属于自己的一种历史、种种法则和一种客观性。语言变成了一个认识对象，就像其他认识对象一样：语言在生物旁边，在财富和价值旁边，在事件和人类历史的旁边存在着。”^④由此可见，福柯所说的西方文化认识型第二次断裂时的语言消失，并不是说语言不再存在，语言作为“词”的重要表现形式开始获得自身的深度，这也是与古典时期知识型中语言的最大区别。

福柯认为进入到当代知识型时，词只表示其他词，不指涉物。“词”与“物”统一关系彻底被打破，两者只是独立存在着，没有任何关系。福柯的《词与物—

^①吴猛、和新风.文化权利的终结——与福柯对话[M].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111 页.

^②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M].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 年.第 3 页.

^③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M].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 年.第 132 页.

^④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M].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 年.第 386 页.

—人文科学考古学》主要考察前三种知识型，因此我们对当代知识型的具体特征及意义价值等不作深入探讨。

二、西方文化知识型转变中的典型形象

福柯认为，西方文化知识型在三次转变中分别以一个典型形象为代表，他既宣告了上一个文化知识型的结束，也代表新的知识类型时代的到来。实际上，各种知识型的转变是以“词”的转变标志的，这主要体现为知识型转变中的典型形象所使用的“词”不同。

（一）第一次转变：以堂吉诃德为代表

在《词与物》的第三章开篇，福柯就明确说明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是西方文化知识型第一次转变的典型形象。堂吉诃德的历险以及历险中所经历的一切挫折和磨难，标志着一个界限——那个信奉“相似性”的文艺复兴时代已经结束，用福柯的话说就是：“它们结束了相似性与符号之间古老的作用；并在那里已经结成了新的关系。”^① 通读这部作品的读者都知道，小说主人公堂吉诃德深爱中世纪骑士文学，尤其喜欢读骑士小说并沉迷于此而不能自拔，因此他开始了自己的冒险生活，这种生活在他眼里是和中世纪的骑士生活相似的，他见到一切相似的东西都会驻足并做出一系列的荒诞之事，然而这种荒诞在他看来是合理的，只是他所生活的时代的“群体共识”已经发生了变化，因此他与风车战斗等行为在人们眼里便成为笑话，他本人也被人们视为疯子，他不知道他所看到的城堡、夫人和军队是畜群、女仆和客栈，换句话说，他看不到差异性，福柯说他：“是关于‘同’的英雄。”^② 他所坚守的书本中的“词”已经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了，“词”与“物”的同一关系已经消除。“物除了成为自己所是的一切以外，不再成为其他任何东西；词独自漫游，却没有内容，没有相似性可以填满它们的空白；词不再是物的标记，而是沉睡在布满灰尘的书本中。”^③

“词”的转变导致“词”与“物”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正如堂吉诃德所使

^①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M].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61页.

^②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M].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61页.

^③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M].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63页.

用的“词”已不再和现实中的“物”相似，故而西方人坚守的“相似性”原则被同一和差异所取代，堂吉诃德也成为“文艺复兴世界的一个否定，因为，他不停地寻找的相似实际上是一个骗局和幻觉。他逐渐发现，物与物之间，词与物之间不再相似，物存在于自身的同一性之内，物就是物自身，词也不再是物的记号，它们剔除了内容，对符号进行解释来寻求相似已徒劳无益，总之，文艺复兴世界赋予物、词、相似的意义和价值开始遭到动摇和质疑，而这正是古典时代的开端。”^①

（二）第二次转变：以萨德为代表

福柯指出西方文化知识型第二次转变的典型形象是萨德。萨德笔下的人物是欲望的化身，他的代表作《朱斯蒂娜》和《朱利埃特》在此历史阶段的地位和文艺复兴时代的《堂吉诃德》相似。可以说：“萨德的角色在古典时代的另一终端、在古典时代衰落时与他（堂吉诃德）对应。不再是表象讽刺地战胜相似性；是欲望之晦涩而反复的强力拍打着表象的边界。”^②萨德的时代，表象变得薄弱了，欲望开始以无遮蔽的形式崭露头角，表象世界的消失意味着古典时代的结束，在萨德时代，表象和欲望相比已经变得微乎其微，朱利埃特作为欲望的主体：“把被表象物的这一厚度变薄了，以便欲望的所有可能性以一种无丝毫缺点、无丝毫沉默、无丝毫遮蔽的方式显露出来。”^③因此，我们可以说萨德的《朱利埃特》如同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一样，结束了一个时代，然而又开启了另一个时代的大门。

欲望是萨德时代的代名词，也是萨德所使用的“词”，这些“词”避开了表象的空间，表象的时代随着欲望的拍打而逐渐消失。“词”不再与表象世界的“物”对应，萨德也敲响了古典话语的最后音符。“萨德抵达了古典话语和思想的终点。他恰恰统治着他们的边界。”^④福柯之所以把萨德视为古典时代结束的典型形象，原因也正在于萨德作品所使用的语言已不像传统的语言那样在知识领域中占有主要的地位，而是已经成为纯粹的对象。萨德的作品符合了福柯对于文学的界定，萨德的“词”也正符合了福柯的话语观。

^①汪民安.福柯的界限[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年.第79页.

^②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M].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 2002年.第279页.

^③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M].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 2002年.第279页.

^④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M].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 2002年.第280页.

（三）第三次转变：以尼采为代表

西方文化认识型第三次转变的典型形象是尼采。尼采的思想在西方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的很多观点、理论诸如对“意志”、“生命”的推崇，超人学说以及“重新估价一切价值”等都在西方文化界产生强烈的震撼，而他的重估与批判也对福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尼采对于语文学、对于传统的语言观的批判，引起了福柯的巨大共鸣，也成为福柯话语观诞生的重要基础。尼采的思想在二十世纪得到西方人的认可，人们也把他称为“古典哲学的终结者”和“现代哲学的开创者”，正如福柯把尼采视为西方文化认识型第三次转变的典型形象一样。福柯的《词与物》重点考察了语言的本性，“词”与“物”究竟有无统一性，或者说是否应该遵循着“词”与“物”的对应关系，福柯以两者的关系为基础阐述了他的话语观。而尼采对于语言的解析恰恰被福柯所认同，在福柯看来：“尼采是当代认识型的先驱，当代认识型必须解开复杂的语言之谜。正是尼采这位杰出的语文学家才是第一个把哲学任务与语言反思联系起来了，并且就语言的存在问题仍是当代认识型所面临的惟一最重要的问题而言，福柯在尼采那里追溯到了当代认识型的理论根源。”^①与此同时，尼采提出“上帝死了”的观点，这就等于否定了传统形而上学的一切“存在”，尼采认为生命是唯一的存在。传统的存在被否定，也就等于“物”被否定，那么“词”也就无法再指涉“物”，两者互相独立。

福柯对西方文化知识型的梳理和解析为我们理解他的话语观提供了帮助，他对不同历史时期文化知识型的解析都是以“词”与“物”的关系为基础，两者之间关系的变化也决定着“词”在不同时期的地位和作用的不同，这对于我们下文更好的解读福柯的话语观意义重大。

第二节 福柯对“词”与“物”不对应关系的解读

一、“形象的叛逆”

比利时超现实主义画家玛格丽特曾经有一幅关于烟斗的作品，画面上明明是

^① 莫伟民.莫伟民讲福柯[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第 126 页.

一只烟斗，但画家却在画布上标明“这不是烟斗”，从而使文字与形象之间产生了背离，这部作品也被称作《形象的背离》或者《形象的叛逆》。福柯曾对此画作进行剖析，而福柯之所以关注这幅画作并进行深入的分析，原因也正在于此幅画深刻的展示了“词”与“物”的不对应，这种文字与形象之间的背离，打破了传统的相似性原则，在玛格丽特的画作中，言语具有了否定性的力量，不再作为图画的解释而存在，图画与文字之间的统一性消失，这也正符合了福柯的话语观，他认为“词”与“物”之间本身就有着不确定的关系，“词”单纯为了表象而存在的理解是将“词”的功能缩小了，这种理解是不正确的。

从西方传统的“摹仿说”角度来看，图画就是实物的象征，而语词就是对图画的解释，图画与语词都是为了表象实物，严格来说，在前人眼中，表象和实物并无明确界限，甚至就是一回事。表象本身没有实际意义，它只是为了实物而存在。表象的内容越接近实物，那么图画的水平就越高。福柯在《词与物》中明确的指出，西方人对于语词的看法并不正确。正如玛格丽特的《形象的叛逆》问世时所引起的轰动一样，福柯的评论《这不是一只烟斗》也引来很多人的关注。福柯通过对语言符号与造型要素的分析，阐发了他对《形象的叛逆》这幅画作的看法，也在某种程度上显露了自己的话语观。《形象的叛逆》打破了相似性的原则，福柯说：“玛格丽特施展了词与形的技巧，而《这不是一支烟斗》表现的是言语对物形的切入及言语所具有的否定和分解的潜在力量。马格丽特常常试图在词与物之间建立新的关系，这样做的结果是画面表达了难以言传的荒诞。语言符号作为唯一例外，不听从于画面的造型表现和相似原则，它游荡在形象的外围并出其不意地扰乱了形象的相似性。”^① 实际上，“词”与“物”之间有着很复杂的关系，福柯所关注的也正是玛格丽特在《形象的叛逆》中所建立的“词”与“物”的新关系，透过两者的新关系，可以发现语词的新功能。“在一个空间里，每一种要素仿佛都服从唯一的造型表现和相似原则。但是，语言符号却像一个例外。它们在远处围绕着形象的游荡。专横的题目好像已经把它们永远同形象隔开。但是，请不要误会，实际上它们又悄悄地接近形象。语言符号把紊乱引进全部形象及其细

^①林贤治. 福柯集[M]. 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8 年. 第 124 页.

腻的相似性中。紊乱实际就是仅仅属于语言符号的有序。”^①福柯不同于大多数人那样，认为《形象的叛逆》这幅画奇特之处就在于语词与事物之间的矛盾，在福柯看来，这种矛盾是不存在的，语词其实已经无声的发挥了作用，使形象得以在“词”中显现。福柯认为这也正是玛格丽特的聪明之处，他仅凭“这不是一只烟斗”的标题，就使形象由此而生，并且与画的空间相脱离，从而进入漂浮状态，这也正是我们常说的“漂浮的能指”。

福柯本人十分重视语言的作用，并且形成了他独特的话语理论。他认为语言和人的生存问题息息相关，而且他研究犯罪、精神病等问题时都结合了对语言的运用。因此，“关于语言的理论成为他的人文科学和社会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②不仅如此，福柯还认为：“任何事物都依赖于语言，作为内在结构的词与外在现象的物之间，存在着不可分的连结。他力图揭示隐藏在语言的深处的事物的秩序的类型或知识的信码，这些型式和信码把词与物结合在一起，并且构成了文化和知识的潜在统一性，他把这称之为一种‘考古学’。”^③福柯在论述语言的重要性的同时，又指出18、19世纪以人类为中心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进入当代之后，“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④福柯在《词与物》的最后一章宣告“人之死”，意味着话语的诞生，也标志着独特的话语理论的问世。

二、福柯的话语理论

福柯的《词与物》是一部关于话语研究的理论著作。因为这部著作以语言为线索、用考古学的方法来探究人文科学、寻求人类历史的发展和演变。

在福柯以前，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就提出了“能指”与“所指”的概念，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并得到人们的认可。而福柯并不赞同索绪尔的二元对立，提出了第三种表达——话语，这种“话语”不等同于语言，正如他在《知识考古学》中所强调的那样：“话语是由符号组成的，但它们所要做的要比用这些符

^①林贤治. 福柯集[M]. 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8 年. 第 125 页 .

^②黄颂杰. 福柯的话语理论述略[J]. 南京社会科学, 1990 年. 总第 40 期.

^③黄颂杰. 福柯的话语理论述略[J]. 南京社会科学, 1990 年. 总第 40 期.

^④米歇尔·福柯. 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M]. 莫伟民译. 上海三联书店, 2002 年. 第 506 页.

号去指物来得更多。正因为这个更多，使得它们不能被归结为语言和言语，而我们正是要揭示和描写这个‘更多’。”^①随着“话语”这一概念的提出，福柯独特的话语理论问世。

福柯认为：“一切知识都是通过描写而得到的，经过中介而被组织在话语中的，只有通过‘词’才同物联系起来的知识。因为，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只是一种话语关系，任何脱离话语的东西都是不存在的。”^②我们生活的世界脱离不了“话语”，“话语”已经深深地植入我们的生活之中并将继续存在。在《词与物》的结尾部分，福柯所预言的“人之死”之后的新时代里，“话语”所探讨的内容不再是人、不再是“思考的主体”，而唯独只有“话语”本身，主体已经被消解。“话语”构成了相对独立的存在，不再受着人的意识的支配。用刘北成的话说就是：“话语或语言成为一种自身的游戏。”其实，在福柯看来，“话语”就是创造者本身，可见福柯非常重视“话语”的作用，这一概念在福柯那里已经被赋予以本体论的含义。福柯的不同之处绝不仅仅在于他提出了“话语”这一概念，他对话语结构、作用、特征等的分析才是他的话语理论的重点。

福柯说：“在任何社会中，‘话语’的产生既是被控制的、受选择的、受组织的，又是根据一些秩序而被再分配的，它们的作用是转移其权力和危险，应付偶然事件，避开其臃肿麻烦的物质性。”^③可见，在社会现实中，“话语”的地位并不自主，他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最主要的就是要受到人这一主体的支配，人借助“话语”这一工具制定了法律、发展了势力并且延续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正如福柯在《什么是作者》这一文章中所说道的那样：“话语自从有了‘作者’以后，就变成了为作者所拥有的财产。自从形成了话语所有制以后，话语就不但同作者，而且也同引用该话语的人的势力连在一起，从而变成一种特定的社会历史力量。”这样，“话语”获得了一种权力，这种权力是被人所赋予，“话语”处于人的控制之下。福柯指出，各个社会控制“话语”方式主要有三种。第一个就是“排斥原则”，这一原则又包括三个因素，即“禁止”、“区分和排斥”以及“求真意志”。

^①米歇尔·福柯. 知识考古学[M]. 谢强等译. 北京三联书店, 1998年. 第49页.

^②黄颂杰. 福柯的话语理论述略[J]. 南京社会科学, 1990年. 总第40期.

^③王治河. 福柯[M].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2. 第44页.

个人因为身份、场合的不同，要选择好说话的方式和内容，谁也不能随心所欲的说话，要考虑到环境的“禁忌”、社会礼仪的“禁忌”以及说话对象的“禁忌”等因素；与此同时，还要注意“对某些‘疯癫’话语的区分和排斥”；“求真意志”在“排斥原则”的三个因素中占有统治地位，它是一种价值观，以不同社会时期不同的知识形式为基础，隐蔽的发挥着作用，控制着人们的思考和判断。控制“话语”的第二个策略是话语的内在规则，包括“评论原则”又被称为“注释方法”、“作者原则”以及“学科原则”。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会存在着特定的“话语”，用来被人们重复、变换，这就是所谓的“评论原则”；而作者的观念以及组织“话语”的原则可以使文本获得一种统一性，福柯很反对这种原则，他认为这样做就限制了文本的初始含义：“作者乃是对增生意义加以约简的原则。”此外，学科领域的不同又限制着“话语”的使用。最后，第三个控制“话语”的原则即话语主体在使用“话语”的过程中被给予的限制，包括“说话礼节”、“话语圈子”、“教义”和“社会对话语的占有”等等。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话语”在社会和人的控制之下已不是单纯的言。“一种话语就是一种调控权力之流的规则系统，无论这种权力是肯定的，还是司法的。话语在权力和欲望的战斗中刺激和提升兴趣。话语一旦形成，它就为分析提供了一个领域，而这种分析是我们进行自我认识的一个中心部分。因此，一种话语就是一个理解助手。”^①此时，福柯看到了“话语”与权力的关系。实际上，在1970年以前，福柯只关注“话语”，通过考古学的方法，来研究“话语”本身，以及“话语”在任一知识领域内是如何形成的等问题，简单地说就是把研究目光停留在“话语”自身。而进入1970年后，随着研究的深入，福柯发现“话语”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它和社会权力、秩序等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任意一种“话语”的形成，都不是由知识本身建构而来，它和社会权力息息相关。与此同时他还发现，权力不仅影响和制约“话语”的形成，而且在“话语”形成之后，本身就会带有某种权力，成为“权力话语”。

西方文化进入到当代时期，语言开始被人们所重视。在福柯看来，此时语词

^①张世英、赵敦华.福柯[M].中华书局.2008年.第38页.

已经不再是事物的反映，它已经成为权力竞争的手段和场所。它的存在只是为了满足权力的需要，人们可以用它去说服旧有的话语，从而建立一种新的话语权。福柯话语理论的关键因素就是权力，然而福柯研究的重点并不在于提出话语与权力之间存有关系这一新的观点，而是为了阐明他独特的话语理论，目的在于颠覆这种被传统权力所控制的话语霸权现象。由此可见，福柯并不赞同现代社会把“话语”当做权力的代名词的做法。在他看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话语”能强化权力，同样也能将其破坏，甚至可能颠覆它的存在。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就强调了“话语”的自治，也就是福柯所说的“话语”的新的力量：“话语拥有了新的力量，只属于它自己的特殊力量。”^①由此，“话语权”诞生。

福柯的话语观的确是复杂而又丰富，他所提出的“话语”概念具有深刻的理论内涵。这一话语理论无法简单的去理解，它的丰富性决定了其要领的难解。然而，通过上文对福柯话语理论的梳理和解读，我们还是能发现，福柯重视语言的作用，甚至把语言放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上，使得它与物走向了分离，其实这也是福柯的用心之处。福柯否定看图识字，否定“词”与“物”的对应关系，福柯在一次关于《世界报》的谈话中说道：“我们生活在一个符号和语言的世界。……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认为，不存在什么真实事物，存在的只是语言，我们所谈论的是语言，我们是在语言中谈论”。福柯对真实事物的否定就是否定了传统“词”与“物”的统一，这种观点在西方现代文化中，算是一种个性的追求。然而福柯对语言的看法，乃至他的话语观都不是凭空自制出来的，他的理论得益于前人、同时代学者等的研究，海德格尔就是其中之一。

福柯生前曾在一次谈话中说道：“对于我，海德格尔一直是核心思想家。我先读的是海德格尔，然后是马克思；我仍然保存着读海德格尔时所作的注释；这类注释我作了不少，比我读黑格尔或马克思时所作的注释更重要的多，我整个的哲学发展，都是由我对海德格尔的解读决定的”。由此可见，海德格尔的思想的确对福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从福柯的话语观来看，海德格尔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对语言的重视上。海德格尔曾说：“我们不仅是说这种语言，我们从这种语言而来说

^①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M].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506页.

话。”^①这句话实际上是在说“道说即是语言的本质，它先于人的一切话语活动而展开，它将一切居有并持存，让一切在场和不在场者自行显现。从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之家’”。^②海德格尔把语言放在了超乎“存在”的位置上，认为“存在”要通过语言来描述，这种现代语言观对语言的重视程度显而易见，福柯的话语观就是受到海德格尔理论的影响，他们都不再仅仅把语言当做表达思想的工具，他们认为这种传统的语言观是轻视语言的表现。在此我们看到了福柯和海德格尔的相近之处，他们不仅对传统的思维方式提出挑战，而且都用全新的视角来看待语言。具体表现为：

首先，在对传统思维的突破方面，他们存在着思想上的继承性。思维方式上的影响可以说是海德格尔影响福柯的主要方面，中国研究福柯的学者王治河认为他们有着一种共同的思维方式，他把它称为：“后现代思维方式”。原因在于福柯和海德格尔同是反对封闭的思维模式，去追求开放的“异质性思维”。这种开放性的思维不仅体现在他们对待语言的态度上，在他们理论的各个方面都能够得到体现。传统的思维可以说是一种“有限的思维方式”，福柯和海德格尔采用了不同的方法对它提出挑战，海德格尔是通过提出“存在”这一概念、而福柯则是通过权力与语言结合的理论来颠覆传统的思维方式。但在挑战传统思维方式方面，福柯深受海德格尔之教，比如对于“好奇心”的认识和分析上，福柯就和传统哲学观点有着很大的区别。传统哲学把“好奇心”视为“无益”之物，福柯却表示他很推崇这个词。“福柯所理解的‘好奇心’，是那种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唯一值得带着一点固执去遵从它驱使的那种好奇心。”^③福柯认为“正是好奇心使我们摒弃熟悉的思维方式，‘改变自己观察事物的方法，改变自己对所知道东西的范围，并想冒险从那里越界’。”^④对于“好奇心”的理解和认识只是福柯挑战传统思维方式的一个表现，福柯的很多观点、理论乃至他的整个哲学思想都透射出反叛的光芒，尤其是本文所论述的福柯通过对西方文化不同历史时期“词”与“物”关系的解

^①海德格尔. 在通向语言的途中[M]. 北京商务印书局, 1997 年. 第 254 页.

^②王治河. 福柯[M].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2 年. 第 211 页.

^③王治河. 福柯[M].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2 年. 第 217 页.

^④王治河. 福柯[M].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2 年. 第 217 页.

读进而提出他独特的话语观，更是能看到福柯对传统思维方式的变革和批判，下文对此会做详细论述。

其次，在对语言的认识上，他们都选择了不同于以往的视角，而他们的共同之处主要集中在对语言本质的认识上。“海德格尔的语言哲学，是建立在对传统语言观的摧毁之上的。这种语言观将语言视为指涉外部实在的符号系统，它服务于并且依赖于它所指涉的对象。”^①福柯也是一样，他认为是先有语言的运用，才有人这一主体的诞生，他还提出了“在外面思考”的思考方式，用来说明主体的产生实际上是在意识以外的语言中完成的。“福柯一向认为，语言的运作本来就是在主体之外，依据其本身的特有结构进行，所以，‘在外面’的思考之所以必要，就是因为语言原本就是在意识的外面运作和活动。反过来，也只有通过语言的解构，才能彻底弄清‘主体’的奥秘。”^②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海德格尔和福柯看来，语言不是供人类交流使用的工具，语言的实质是一种脱离于人的操纵和控制的独立性存在。这对于传统的语言观来说，无不是一种挑战。

此外，海德格尔和福柯在对现代技术和传统的人道主义的批判等方面也存在着很多相似之处，由于与本文所论话题联系不紧密，故在此不作赘述。事实上，福柯话语观的诞生，绝不仅仅是受海德格尔一个人的影响，前人尼采、当代的维特根斯坦等的理论、观点都对福柯话语观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尼采的思想、批判精神和风格给予福柯丰富的启示，使他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明显地成为法国新尼采主义的表率。但是，福柯又不是尼采思想的简单重复者，而是以其独有的创造性精神，将尼采的思想原则灵活地运用于他的批判活动中。”^③而维特根斯坦也曾经说过：“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存方式。”这种把语言和生存联系起来的观点的提出，维特根斯坦不是第一人，他们对语言的重视都为福柯的话语理论的创建提供很大的动力。同时，也可以看出，福柯反传统的话语观绝对不是这个时代的个例，福柯是在西方社会进入 20 世纪之后普遍开始重视语言的大背景下提出他的话语理论的。然而，福柯的话语观又是独特的，因为他以西方文化中

^①王治河. 福柯[M].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2 年. 第 57 页.

^②高宣扬. 福柯的生存美学[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第 122 页.

^③高宣扬. 福柯的生存美学[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第 19 页.

“词”与“物”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关系为基础来阐述自己的话语观。福柯的话语理论否定了传统的看图识字、否定了西方人遵循了几千年的“词”与“物”的对应原则。“话语”这一概念的提出意义重大，不仅打破了传统的“语言——言语”二元的思维定势，还使得“话语”这一被人们忽视很久的概念获得了生存的空间。福柯的话语观是一种有个性的追求，福柯开阔的思维也打破了传统线性思维的单一模式。这对于西方文化乃至全世界学术界来说都是宝贵的资源和无价的财富。

福柯的话语理论是在颠覆西方文化的背景下产生的，上文已经提到福柯不是这个时代的独行者，其实西方社会自从进入到 19 世纪以后，人们就已经开始向传统提出挑战，对过去很多约定俗成的理论、观点、见解等大胆的提出否定。福柯是这个否定的队伍中的一员。除了福柯否定传统“词”与“物”对应的关系以外，还有很多学者提出类似的观点。在理论方面诸如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罗兰·巴特等分别用自己的方式提出了语言的重要性，直接或者间接地否定了“词”与“物”的对应，使得“词”高于“物”，动摇了两者传统的平等地位。这些理论家见解独到，对后人产生重要影响。然而，对“词”与“物”的对应关系提出挑战的绝不仅仅限于理论界，文学家、语言学家、绘画家等通过他们的作品也向人们诠释了“词”与“物”的不对应。他们的主张有的为福柯的话语理论提供了背景上的支持，有的则直接被福柯所用，成为支撑他话语理论的重要依据，前者如现代派文学、后者则非萨德莫属。

第三节 “词”与“物”的不对应在文学方面的表现

文学上强调“词”与“物”的不对应要从西方现代派文学说起，他们的作品荒诞离奇，给读者带来心灵上的撞击；而萨德的文学作品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福柯也因此把它称为西方文化知识型转变中的典型形象。简而言之，他们都是颠覆传统队伍中一朵亮丽的奇葩。首先，我们从现代派文学谈起。

一、现代派文学对“词”与“物”对应关系的颠覆

文学创作上的现代主义精神主要体现在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形式上采用不

同于以往的新奇手法，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甚至是荒诞离奇之感，透过形式将精神上深层次的东西表现出来，穿透读者的内心，从而使读者在灵魂深处受到启迪；在内容方面，现代派文学不重视故事情节的复杂多变，也不注重人物形象的鲜活生动，而是多借助于人物的动作或语言甚至是毫无逻辑性可言的胡言乱语来表达情感，留给人们的不是阅读时的扣动心弦，而是阅读后的沉思、冥想。现代主义文学最早起源于法国，也是在法国发展、壮大。法国的现代派和后现代派文艺创作上的启示对福柯的话语理论产生重大影响。

法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以波德莱尔为代表，后期以贝克特为代表。后现代主义文学在创作原则等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前期现代主义，最主要表现在他们对传统文学语言的颠覆上，通过荒诞离奇的语言解构了“词”与“物”的对应关系，具体如下：

（一）以波德莱尔为代表的前期现代派文学

19 世纪 30 年代，以波德莱尔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流派兴起，这一文学流派在创作上打破旧有的文学创作传统，采用“非语言”的形式进行写作，并且大量运用隐喻、象征、暗示等手法，取代传统正面叙述的模式，为文学创作开辟了新的道路。现代主义文学流派众多，最早的流派是象征主义文学，创始人为波德莱尔，以波德莱尔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大胆的颠覆传统，鼓吹非理性主义，给西方社会弘扬了几千年的理性主义文化带来巨大冲击。现代派文学在创作方面一定程度上彰显了神秘主义，把非理性、超理性的灵感、直觉等作为创作的源泉，创作出的作品更是形态各异，有的在题材方面选用丑的事物，“以丑为美”也成为现代派文学在艺术方面的特征；有的揭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关系的异化，从而表现出人类内心的孤独、恐惧感。可以说，现代派文学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颠覆本身就是对“词”与“物”对应关系的否定，既然人与社会不再和谐，人已经被异化，那么人所创作的新事物、人所使用的语言、文字等也就不再是对自然、对社会的客观反映。另外现代派文学不仅否定理性，还否定客观世界，作为“词”的源泉的“物”已经被否定，那么两者的对应关系又何以存在。这是现代派文学在题材、思想内容等方面对“词”与“物”关系的颠覆。在形式方面，尤其是语言

上，现代派文学突破旧有的语言束缚，很多时候人物所说的话意义并不清晰，让人找不到现实的对应物，“词”与“物”处于分离状态，下面将以 19 世纪法国著名诗人、象征主义者，也是现代派文学理论的重要奠基人马拉美为例，来说明现代派文学对传统“词”与“物”关系的颠覆。

马拉美被称为象征主义诗歌的三大先驱之一，他的诗歌语言晦涩难懂、形式新颖另类，他认为理想的文学作品就应该是难以解答，只有通过“暗示”去传达意义，才能展现文学的魅力。因此，马拉美的诗歌大多数都是无法从表面的词语中读出其内涵。在马拉美看来，文学不再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而是展现了世界背后的神秘力量。他还提出这样的观点：“文学使用词语写成的，文学不等于世界；词语作为概念，不仅不是物，而且是对物的否定。”^①由此可见，马拉美不承认词语与事物的统一关系，认为“词”是对“物”的否定，这就颠覆了二者的对应关系，他的观点也是这个时代大多数文学家、文艺理论家的共同看法。

（二）以贝克特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文学

进入 20 世纪，后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兴起，此流派继承了前期现代主义文学流派的创作思想、原则等，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发展出在思想内容、艺术特征等方面都标新立异的文学流派，比如存在主义文学、荒诞派戏剧、黑色幽默派等，可谓五花八门。后现代主义文学除了继承前期现代主义象征、梦幻、意识流等手法外，很多作家还采用新的技巧，比如运用舞台道具、重视布景等，很多文学作品的怪诞之处就是使用文字游戏，让人不知人物所云为何物。而此时也正是法国文艺界大肆颠覆语言的时候，从达达主义到超现实主义都是这样，语言完全与事物相脱离，两者的关系不再统一。

后现代派文学的代表贝克特就是一个善于运用舞台道具、重视布景的作家。比如他的代表作《等待戈多》，舞台上看似简单的道具恰恰给读者和观众带来阴郁的情绪，荒凉的布景更是增添了荒诞之感，这样贝克特所要表达的人类的精神危机就展现在读者眼前了。贝克特等后现代文学家的作品给人们的心灵带来震撼，同时也引起了很多理论家的关注，福柯就是其中之一。福柯的话语理论受到了后

^①秦海英. 文学如何存在——马拉美诗论与法国二十世纪文学批评[J]. 理论研究, 995(3) .

现代派文学的很大影响，作家们所采用的文字游戏等技巧也成为福柯研究“词”与“物”关系的重要理论依据。

二、萨德文学对“词”与“物”对应关系的颠覆

萨德的作品诞生于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社会背景下。他的作品涉及到了很多的色情描写，在当时曾一度被封杀。然而他的作品思想深刻，很多后人并不把他看作情色作家，他的作品也被很多人称为哲理小说。

《朱斯蒂娜》是萨德的经典代表作，朱利埃特利用自己的美色换取了很高的社会地位，而她一直洁身自好的妹妹朱斯蒂娜却沦为社会上最底层的人，受到无数的侮辱和委屈。萨德的作品，大部分都是偏离常规的，他选择全新的视角、运用暴力的语言，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学风格，这种风格对于传统文学来说是极大的挑战。福柯在分析西方文化知识型时把萨德当作转型的典型，并把萨德作品中的人物看做是欲望和表象的象征。福柯称朱斯蒂娜为“无限的欲望对象”、称朱利埃特为“欲望的主体”，通过对两者的分析，得出结论：萨德是借着她们的故事结束了古典时代。

萨德的作品被福柯直接引用，作为他解读古典时期文化知识类型的依据，并以此来证明“表象”时代的结束，“词”与“物”走向分离。因此，萨德及其作品对福柯的话语理论的形成有着直接的贡献，萨德本人那种反传统的精神也和福柯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我们不得不说萨德对福柯的确有着非同小可的影响。

第三章 福柯话语观的审视

福柯的话语观是从否定“词”与“物”的对应关系开始的，进而提出了“话语”的独立性问题。福柯一向被后人视为一个反常规的学者，不仅他的话语理论，他的整个哲学思想乃至涉及到哲学以外的所有学科都被打上了“反规范”的印记。很多知名的研究者对他的评价也离不开“反规范”甚至是“激进”这样的用词，比如王治河说道：“福柯以倡导‘用非常规方式思考’著称，以‘反规范’闻世，‘其哲学风格的特点就是反规范’福柯的写作程序和对象都是非规范性的。他的话语都是纯描述性的，而不是规范性的。”^①福柯的话语是不规范的，那么他的话语观也一定带有“反规范”的特征。自从福柯的话语观问世以来，人们的评论不一，有的人认可福柯对于“话语”的看法，而有的人则批评福柯的话语观过于另类，只能作为一家之言。不管怎样，福柯话语观的诞生引起了学术界的震动，他的话语观也影响到了文学、新闻学、语言学等各个领域，这也是它的意义所在。福柯话语观提出后引发的关于“词”与“物”、关于“话语”独立性的各类讨论与思考，对于促进社会文化的进步起到了积极作用。下面将具体谈到福柯话语观的意义和影响。

第一节 福柯话语观的意义和影响

一、福柯话语观的意义

首先，福柯的话语理论丰富了人们的思想。虽然福柯的话语理论复杂、难懂，但自从他提出“话语”这一概念之后，人们旧有的思维定势被打破了，不再信守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语言——言语”二分法。福柯让人们知道了除了“语言”、“言语”之外，还有“话语”这一“组合体系”。其实，“话语”这一词并非由福柯首次提出，在16世纪时人们已经开始使用，但是在当时它是指人们谈话的各种形式，也可以指针对某一问题而作的比较深刻的讨论；到了18世纪，“话语”一词变成

^①王治河. 福柯[M].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2年. 第22页.

了专业术语，很多艺术评论等都开始使用它来做题目；进入到 19、20 世纪以来，语言逐渐的被人们所重视，人们便开始使用这一词语来指称比较长的语句，和“语言”、“言语”的区别并不太大。直到福柯正式提出“话语”这一概念，人们才开始认识到“话语”有着区别于“语言”、“言语”的更丰富的内涵，福柯提出这一概念并使它与权力等因素结合起来，这对于人们的思想来说是一种开拓。

其次，福柯的话语理论拓展了人们的思维领域。“话语”这一概念本身的复杂性和多义性以及福柯所给予它的新的内涵，使得人们对“话语”的认识更加的深入。福柯将“话语”和知识、意识形态等结合起来，并且提出了完整的理论体系来支撑他对于“话语”的看法，“话语”的深刻性和丰富性无疑开拓了人们的视野。

再次，福柯将“话语”和权力结合起来，极其富有创造性，不仅拓展了“话语”的功能，而且也使得权力的问题备受关注。在福柯看来，权力是控制“话语”的关键性因素，每个社会时期都有特定的“话语”影响着人们的思考和行动，因此社会上便有了规章制度，人们在无意识中就受到这些规范的限制和约束，因此我们可以说“话语”其实就是一种权力的运作。“话语”和权力之间是一种双向运动，权力首先控制着“话语”，创造着“话语”的形式和对象，反过来这些形式和对象也会强化某种权力甚至创造出新的权力。“话语”和权力是相互创造的，这在福柯生活的年代是极其富有创造性的观点。福柯将两者的关系结合起来，使得人们对“话语”功能的认识变得宽泛了，同时权力问题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对于促进社会文化的进步起到了积极作用。

最后，福柯指出话语是一种实践，这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福柯认为话语也是一种实践。所谓‘知识’则是由‘一种话语实践按照一种有规律的方式建筑的一组因素’，没有话语实践，就没有知识。……知识是话语提供的争夺、占有和利用机会的结果，与权力、意识形态等等有着密切的关联。”^①这段话中福柯以“知识”为例，来说明“话语”的创建作用。这种观点对于传统的理论与实践的二元对立思维提出了挑战，福柯让人们知道了，两者之间并不总是相对立的，理论本身就有着创建的作用，因为理论也是实践的。反之，福柯指出，

^①刘北成. 福柯思想肖像[M].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第 206 页.

实践本身也具有特殊性，它不是一成不变的，过去的哲学家将理论和实践都“纯粹化”了，纯粹的东西是不存在的。福柯的观点打破了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对立，对于我们重新思考两者关系意义重大。

总之，福柯话语理论的诞生对西方文化乃至世界文化都做出了积极贡献，这也正是这一理论诞生的意义所在。自从福柯独特的话语理论诞生之后，就引起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和密切关注，这一理论不仅影响到了哲学领域，而且也对文学、新闻学等学科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理论的颠覆性更是给后人开辟了一条反传统的道路。

二、福柯话语观的影响

福柯的话语观最大的特点就是反常规。其实福柯本身就是一个追求“非常规”的人。“福柯对确定性、对绝对真理不感兴趣，他只对变换人们看问题的方式感兴趣，只对改变人们的认识视野和偏离常规思维感兴趣，只对探索可能性感兴趣。可以说，用‘非常规方式思考’是福柯毕生的哲学追求。”^①福柯的“反常规”也体现在他的话语观中，通过上文的论述我们认识到了福柯的话语观在挑战传统思维方式、拓展人类思维视野、解析话语与权力的关系及话语与实践的关系等方面都突破了传统的认识，他的这些新观点、新见解不仅对后人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其影响力也波及到了其他的学科领域，文学、新闻学就是受其影响学科中的典型。

福柯的话语理论对文学的影响一方面表现在对传统的文学及其语言提出挑战，另一方面福柯的话语概念还成为人们研究文学文本、分析文学与现实、文学与历史之间关系的重要因素。正如德国研究福柯理论的学者马文·克拉达所说：“在我看来，我们可以以这样的方式来接受福柯的理论：在研究文学文本时把福柯的话语概念用在考察现实权力关系和历史权力关系上，在运用的过程中把它们同社会科学理论结合起来。这样一来，福柯在文学科学的话语分析理论中所起到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在历史的回顾中更为广泛地考虑到时间、环境和影响等要

^①王治河. 福柯[M].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2 年. 第 23 页.

素，即考虑到文学文本产生的关系条件。”^①福柯的一生并没有致力于文学的研究，有人曾经把1961年到1969年称为福柯的文学时期，实际上这种说法并不正确。福柯在这个阶段曾经写过很多和文学有关的评论，但并未正式出版过文学上的代表作，他只是比较重视语言现象，而文学的语言恰恰引起了他的关注。福柯认为文学语言是一种富有创造性的语言，文学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话语系统，文学语言可以完全摆脱人的控制，实现绝对的自由，因此他把文学语言称作“语言游戏”。福柯的话语理论并非用来专门论述文学语言，但它所透射出的哲学的理性、智慧的光芒却对文学创作、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产生重要的影响。福柯将话语与权力结合起来的的思想更是直接或者间接地被文学家、文学理论家所借鉴，从而出现了各有特色的文学团体、文论团体，比如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由此可见，福柯的话语理论对文学的影响不可低估。那么，它是怎样影响新闻学的呢？下文将做分析。

新闻媒介是通过话语（包括语言、文字、声音、图像等）向人们传播信息，它最大的特征就是公开性，也正是因为它的公开性，使得媒介话语成为一种区别于其他话语的特殊话语。众所周知，媒介话语历来在社会权力上占有支配性的地位，媒介是“政府的喉舌”，因此媒介话语便可以称为一种权力话语。人们通过媒介话语获得必要的社会信息，有的媒介话语甚至能影响人们的判断力。媒介话语强大的信息功能也使得人们对它的依赖越来越强，随着依赖性的增强，媒介话语的话语权力也就随之强大。另外，媒介也是传承知识和文化的载体，媒介话语所展示出的文化特征起到了表征社会的功能，人们通过媒介话语可以更好的感知社会，因此便会在不知不觉中把媒介话语当作主流话语，无形中又赋予媒介话语更多的话语权力。

德国一位名为伊丽莎白·内尔—纽曼的传播学研究者在其论文《沉默的螺旋：一种舆论学理论》中提出了“沉默的螺旋”理论，这一理论提出后在新闻界以及其他领域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沉默的螺旋”理论的基本含义是人作为社会的一份子，为了适应周围的环境都会有一种从众的心理，当人们发现自己的建议和大

^①马文·克拉达. 福柯的迷宫[M]. 格尔德·登博夫斯基编. 朱毅译. 商务印书馆, 2005年. 第208页.

多数人的意见一样时就会勇敢的表达出来，而当自己的看法属于少数派时便会采取沉默的态度，目的在于和周围的环境保持和谐，害怕因打破这种和谐而陷入一种孤立的状态。采取沉默一方的态度助长了持相反意见一方的势力，从而形成了对方越来越强而沉默的一方越来越弱的“螺旋”态势。那么，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沉默的螺旋”呢，除了上文所提到的从众心理外，福柯的话语观很好的解释了这一现象。

福柯将权力和“话语”结合起来，他的话语理论也可以说是一种权力话语观。福柯认为权力是控制“话语”的关键性因素，权力的力量可以使某一种话语成为主流话语，也可以使某一种话语处于弱势，甚至被压制。而媒介话语作为现代社会传播信息不可或缺的载体，很自然的便会形成一种权威，它作为权力的代表，很容易影响人们对某一现象的态度、看法，可以说福柯的权力话语观给予“沉默的螺旋”一种区别于传播学、心理学的合理解释，使得人们能够拓展思维，从权力话语的角度看待这一新闻现象。福柯又强调人们选择沉默是行使自己的权利，因为在权力话语的压力下人们要么说谎，要么沉默，为了不说谎，沉默是一种很好的选择。福柯的话语观对新闻学的影响不止表现在“沉默的螺旋”这一个理论上，他提倡的话语权始终都是新闻学中热议的一个话题。虽然福柯的话语理论对新闻学的影响并没有像对文学那样——直接被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等文论所借鉴，但其影响不可小视。

福柯探讨“词”与“物”的关系时采用了“考古学”的方法，他在阐述两者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关系的同时表明了他的话语观，“话语”是福柯重点关注的对象。王治河说：“他对话语的意义和真理性采取了胡塞尔式的‘悬置’态度，他称之为‘意义括出’或‘意义描述’。对此，他自己有过明确的表述：我们因此对话语作‘纯粹的描述’，对话语的分析是一种‘历史分析’，是一种‘避免一切意义的分析：它不去问那些人说过的话里深藏着什么意义，什么是那些话里非自觉的‘真正’意义，或者什么是含而未露的因素。相反，它要知道的这些话语的存在形式，

它们在某时某地出现究竟意味着什么’”。^①福柯对话语的分析角度不同于以往，他采用“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得出的话语理论区别于传统看法，因此福柯的话语理论被视为反传统的代表。然而，福柯颠覆性的话语理论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他的批判精神和分析问题的方式、方法也成为后人效法的对象。从福柯的话语理论中，我们能够学到如何换一个视角看问题；在福柯的启示下，我们亦能在分析问题时得出自己的一家之言。

第二节 当代“词”与“物”的关系

福柯在《词与物》中分析了不同历史时期“词”与“物”的关系，随着两者关系的变化，知识的建构也开始遵循着不同的原则。文艺复兴时代，“词”是摹仿“物”，遵从着“相似”的原则；古典时代“词”与“物”不再统一，“词”用来再现“物”，遵从着“表象”原则；进入到十九世纪，现代知识型形成，“词”与“物”的统一关系已被完全打破，语言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组织结构。那么，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词”与“物”的关系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两者的关系是愈走愈近，还是渐行渐远？福柯的著作没有做出回答，但是透过福柯对文艺复兴等三个历史时期“词”与“物”关系的分析，我们能够得出结论。具体如下：

福柯认为，“词”与“物”的关系是随着历史时代的推移而渐行渐远，从最开始的统一走向了最后的分离。文艺复兴时代遵循着两者的统一是必然，因为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信奉“相似性”，那个时代的历史背景、文化氛围影响着人们认识世界的看法。到了古典时期，“同一与差异”代替了“相似性”，“词”与“物”的关系就会随着“知识型”的变化而变化。那么，试问，到了科技飞速发展、文化走向多元的今天，人们是否还遵循“词”与“物”的统一原则呢？分析之后自然会有答案。

首先，高科技已经成为当今的时代特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很多新鲜事物的产生都被打上了科技的烙印，在没有被广泛应用前，人们很难通过命名来了解这些事物。以计算机为例。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前，计算机还没有得到普

^①王治河. 福柯[M].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2 年. 第 44 页.

遍的应用，当“计算机”这一词汇刚刚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时，人们似乎无法理解它为何物，它的样貌有什么特征、用途何在，更无法知道它竟然有着超出想象的功能，直到今天已成为人们必不可少的工具。简单的说，就是“计算机”这一词已经和实物联系不大，“词”与“物”的统一关系被打破。在科技力量的影响下，人们认识世界已不再信守“相似”原则，似乎在科技飞速发展、信息铺天盖地的今天，出现什么奇怪的词汇、产生什么新鲜的事物人们都已不足为奇，“词”与“物”统一与否已不再是人们关注的问题。因此，各种新鲜的“词”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文字、语言、线条、色彩等“词”都以各种各样的形式产生，很多“词”不再遵守着与“物”的统一，两者的距离越来越远。比如，肢体动作作为“词”的一种，和以前的相比就和“物”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远古时代，舞蹈这一肢体语言的最初发明与现实中的“物”密不可分，动物、植物的形态、动作等就是人们舞蹈动作的摹仿对象。而到了今天，肢体动作已无章可循，各类新鲜舞蹈形式的产生已在现实中找不到对应物，人们单独追求的是形体之美，是能给人们的精神带来享受，而是否遵循着与“物”的统一已经不在人们的考虑范围之内。无论这种肢体动作多么的夸张，多么的荒谬，只要人们喜欢欣赏就会有活力的延续下去。不单单是肢体这一形式的“词”，文字、语言、线条等都进入到了与“物”分离的状态。也许，这才应该叫做“漂浮的能指”。

其次，多元文化的背景下，“词”与“物”的关系很难统一。随着时代的进步，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不断加强，不仅在政治、经济上交往频繁，而且在文化方面也互相吸取精华，形成了多元化与全球化的文化态势。以中国文化为例。中国拥有着上下五千年的文化历史，我们常用“源远流长”一词来形容中国文化，足可见其博大精深。无论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是现代文化都属于复合型的文化。传统文化融合了各家之长，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多元文化体系；现代文化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广泛吸取西方文化中的精华，形成了新的文化面貌。中国古今文化的多元性使得“词”与“物”的关系难以统一。虽然古人在造字、命名事物时遵循着“词”与“物”的统一原则，但这是先人们在认识世界时根据经验所形成的思维习惯。待到传统文化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多元文化体系时，“词”

与“物”的统一关系已不再明显。随着文化的丰富与进步，人们的思维习惯也发生了变化，逐步从传统的线性、单一思维走向开放和多元。到了现代，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开始多样，信息革命的到来让中国的文化更加的丰富起来。人们不仅将中国本土的文化传播出去，而且也不断的吸收他国的文化经验，国际文化之间的交流更加利于文化的创新。在多元文化的时代背景下，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思维方式和传统文化时期相比，也更加的走向开放。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摒弃了“词”与“物”的统一，纵使少数者还追求着这一原始的规则，也很难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寻觅到它的踪影。

总之，当代社会“词”与“物”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两者的距离已经越来越远。那么，这种摒弃“词”与“物”统一原则的做法是否可取，我们是否还应该遵循这一原则。打破两者的统一关系对文化是否有好的影响、对文学是否有好的影响，对认识论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是我们所关注的。

总体来说，我们不能完全摒弃“词”与“物”的统一原则，因为这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基础，离开了这个原则，人们的生活会变得迷茫。纵使打破这一原则能获得很多新鲜的事物，但是一味的追求新鲜只能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不好的影响，到时生活会超出人们的控制能力，从而使人们陷入难以自救的局面中去。然而，我们又不能时时都遵守“词”与“物”的统一原则，因为按部就班的做事会使时代停步不前。当今时代，人们没有很好的把握好“遵守”还是“打破”的界限，因此使得两者的关系走向了分离。“词”与“物”分离的结果就是人们在意识上难以统一，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方式也开始走向多样，这对文化、对文学、对认识论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然而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需要做详尽的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文化上的全球化也势不可挡。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不断增强，各国之间相互沟通，相互吸取文化精华，这一方面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发展，同时也给人们的意识形态打开了新的思路。然而，文化的全球化也给社会带来了不利的影响。由于各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不同，因此在文化上就会表现出各种各样的差别，在文化全球化的势头下，人们一味的接受他国的文化熏陶，久而久之会在意识上受到严重的冲击。以中国为例。当今中国以社会主义的价值

观为主导，人们一直以传统文化中所提倡的仁义、道德、诚信等优良品质来要求自己，几千年来中华辉煌、灿烂的文化被一代代的传承下去。但随着文化全球化的侵袭，西方社会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开始在中国传播开来，人们受到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消极思想的影响，意识形态受到了严重的侵蚀，这一现象值得引起我们的深思，否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优秀成果将会受到威胁、甚至流失。这是“词”与“物”的分离给文化带来的影响。

“词”与“物”的分离对文学产生的影响也很大。早期社会，人们自觉地遵守着“词”与“物”的统一原则。因此，创作出的文学作品符合社会现实，人们能够在阅读的过程中找到现实的对应物，因此理解起来也很容易。作者和读者通过文学作品这一载体达到了情感上的共鸣。而到了现代社会，由于“词”与“物”的关系不再统一，人们便很难像以前一样，通过一部文学作品得到共同的认识、做出相似的评价。文学创作者不再注重其作品是否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是否超出读者的领会能力，所用之词在现实中找不到对应物，因此创作出很多让人难以理解的荒诞、晦涩之作。这一文学现象不是进入到 21 世纪才出现，西方早在 20 世纪上半期就已经产生了反传统的文学，上文所提到的现代主义文学和后现代主义文学就是最典型的代表。而当今时代，文学的种类更加多样，颠覆传统的文学作品更是随处可见。这种颠覆不仅体现在内容方面，形式上亦如此。很多读者在初次接触这类作品时，很难读懂文中所写为何物、所云为何事，另类的表现形式更是让人无法正常理解。除此之外，文学上的消极情绪越来越明显，很多作家和写手把自己糜烂的生活写到作品中，将生活中的不如意夸大，造成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情绪随之低落，对生活丧失信心。这种消极的文学情绪对社会产生了很不利的影响，作家所用之词如果不符合社会现实，就会影响到社会的安定、进步，这也是“词”与“物”分离所带来的间接后果。

“词”与“物”的分离也会对认识论产生很大的影响。认识论研究人的认识和客观实在的关系。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先物质，后认识，我们应该坚持从物质到认识的路线。世界就是客观实在，认识是人对客观实在的反映。也就是说，人们认识世界要以客观实在为基础，脱离了客观实在，一切的认识都不能称之为真

正的认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遵守着“词”与“物”的统一原则，就符合哲学上的认识论规律，反之，则是否定了从物质到认识的认知过程。这对唯物主义哲学认识论来说，无疑是巨大的颠覆。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能够得出结论，“词”与“物”的完全分离不可取，而当今时代人们却恰恰分离了两者的关系。如果人们能够认识到遵守“词”与“物”统一关系的重要性，万变不离其宗，那么以后的文化会更加的进步、更加的辉煌。这是我们通过解读福柯的话语理论衍生出的对“词”与“物”关系的新看法。透过福柯对“词”与“物”关系的分析及其得出的话语理论，我们还需要评价一下后现代主义文化，这是理解福柯话语理论的重要一步，也是本文收笔之时不可或缺的内容。

结 语

福柯的话语理论是在后现代主义的背景下产生的，它的颠覆性与这个时代的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福柯的话语理论也成为后现代话语的重要代表之一。后现代主义形成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融合了文化、文学、哲学、艺术、宗教等多个流派。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脱胎于现代主义，但继承性不强，批判性的倾向更大。“不论从美学观点或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后现代主义表现了我们跟现代主义文明彻底决裂的结果。”^①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各个流派对西方传统的思想和文化都提出了尖锐的批判和大胆的否定。后现代主义一方面批判理性思潮，一方面又利用对话语和语言的新见解来阐明新观点。西方哲学从此就越来越明显的显露出从认识论阶段转向语言论阶段的特征。而福柯的话语理论就是诞生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

福柯的《词与物》运用考古学的方法来研究人文科学，通过语言这条线索来探寻人类历史的发展历程。福柯认为，万事万物都离不开语言，“词”与“物”之间存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他力图揭示隐藏在语言深处的秩序的型式或知识的信码（code），认为正是这些型式或信码把词与物结合在一起，并且构成了文化和知识的潜在统一性。与此相联，福柯认为，现代思想的任务不再是找出概念的连续体和根源性，而是去描述使得概念得以可能的‘知识型’，而后者也话语秩序本身是有联系的，甚至就是一回事。”^②所以，“现代思想的任务就是去描述话语得以可能的条件以及话语的全部层次。”^③由此可见，福柯研究话语的意义就在于透过语言来了解文化和知识，以此揭示出语言掩盖下的“型式”和“信码”才是构成文化和知识统一性的关键。在福柯看来，人文科学就是一个独立的话语体系，人们该把人文科学所有的研究都当作语言和对象的关系来看待。福柯的观点恰恰体现了后现代主义对人文科学研究的变革。

^①詹明信. 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C]. 上海三联书店, 1997 年.

^②彭立勋. 后现代主义哲学和文化思潮的若干特征[J]. 南方论丛, 2003 (3) .

^③彭立勋. 后现代主义哲学和文化思潮的若干特征[J]. 南方论丛, 2003 (3) .

总之，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变革传统和现代文化方面特征明显。否定和批判是这一思潮的主要特征。因此，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产生的新观点、新理论无不带有否定的色彩。如福柯的话语理论，否定了“话语”单纯作为交流工具的观点，而赋予“话语”这一概念更广阔的内涵。然而，后现代主义的批判性也有不足之处，尽管批判能更好的促进文化的进步，但是对现有人文思想、文化传统的过渡批判甚至全盘否定只会使自身走向虚无。因此，后现代主义在名噪一时之后终归走向了平静，很多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理论、观点也随之显示出了自身的局限。福柯的话语理论就是这样。福柯通过分析不同历史时期“词”与“物”的关系而阐明了他的话语观，其中涉及到的知识内容极其丰富，他所提出的权力话语问题更是影响到了多个学科领域，贡献巨大。然而，福柯认为到了古典时代“词”与“物”的关系就走向了分离，而他本人认为“词”与“物”之间是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的。虽然他在论述的过程中向读者澄清了他的观点，但是他没有告诉我们该如何解决“词”与“物”的分离问题，这是其话语理论的局限。正如很多后现代主义思想家那样，提出了问题，但却没有指明解决的途径。

但是，福柯分析问题的角度、方法，思考问题时思维的开阔性，以及他所提出的关于话语的新问题等等，仍旧值得人们去学习和思考。透过福柯这一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话语理论，我们能更好的分析当前中国的文化趋势，对于把握好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有指导意义，这也是我们研究福柯话语观的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英文著作:

- [1] Michel 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M] . New York. 1972.
- [2] Michel Foucault. *The order of things*[M]. New York. 1970.
- [3] Michel Foucault.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C]. New York. 1977.

中文著作:

福柯作品:

- [1] 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M].莫伟民译.北京:三联书店, 2001.
- [2] 福柯.知识考古学[M].谢强、马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 [3] 杜小真编选.福柯集[C].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3.

关于福柯的研究与评论:

国外:

- [1] 伊·库兹韦尔.结构主义时代[M].尹大贻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 [2] 路易丝·麦克尼.福柯[M].贾湜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 [3] J·丹纳赫.理解福柯[M].刘瑾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
- [4] 詹姆斯·米勒.福柯的生死爱欲[M].高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 [5] 布莱恩·雷诺.福柯十讲[M].韩泰伦译.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4.
- [6] 马文·克拉达等.福柯的迷宫[C].朱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
- [7] 吉尔·德勒兹.德勒兹论福柯[M].杨凯琳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6.

国内:

- [1] 包亚明.权利的眼睛——福柯访谈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 [2] 王治河.福柯[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9.

- [3] 刘北成.福柯思想肖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 [4] 汪民安.福柯的面孔[C].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1.
- [5] 陆扬.后现代性的文本阐释: 福柯与德里达[M].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2.
- [6] 张世英、赵敦华.福柯[M].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 [7] 汪民安.福柯的界线[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 [8] 吴猛、和新风.文化权力的终结: 与福柯对话[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3.
- [9] 莫伟民.莫伟民讲福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10] 高宣扬.福柯的生存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 [11] 刘永谋.福柯的主体解构之旅[M].江苏: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
- [12] 汪民安.福柯读本.[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其他:

- [1] 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 [2] 郑克鲁.外国文学史[M].下册.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5.
- [3] 秦海英.文学如何存在: 马拉美诗论与法国二十世纪文学批评[J].理论研究.外国文学评论, 1995.
- [4]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
- [5] 王力.古代汉语[M].校订重排本.第一册.北京: 中华书局., 1998.
- [6]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M].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
- [7] 拉曼·塞尔登.文学批评理论: 从柏拉图到现在[M].刘象愚等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 [8] 沈湘平、韩毅.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M].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 [9]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M].第2卷, 1995.

致 谢

怀揣感恩和激动的赤诚之心，我得以在此刻向所有帮助我完成论文的老师、同学们表达谢意，真的万分荣幸。

历经一年多的准备和写作，我的论文终于完成了。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为我付出最多心血的就是我的导师——敬爱的张奎志老师。当初考黑龙江大学文艺学专业的研究生我是慕名而来的，张奎志老师严谨的教学态度、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诲人不倦的崇高师德在三年的学习生活中我深有体会。最后这一年半，张老师不断的教诲我、指导我，更是让我感动不已。正所谓“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张老师正是用他学者博大的胸怀、父亲深沉的慈爱来指引、关心我，让我对未来、对人生都有了明确的目标，这是我三年来最大的收获，更是使我终身受益的财富。本论文从选题到完成，张老师的指导相伴始终，当初我对这个论文心怀胆怯，是老师的鼓励让我有勇气写下去、是老师的信任让我战胜了重重困难。如今，手捧论文的成稿、眼含感激的泪水、怀揣感恩的诚意，我要向我的老师献上最诚挚的敬意，愿老师健康快乐、桃李满天下。

我要感谢郭玉生老师三年来对我的教诲，他传授的知识使我受益匪浅。郭老师渊博的学识让我敬仰，更是我学习的榜样。另外，感谢马汉广老师给我提供的大量资料，让我在准备论文时省去了很多时间，那些资料对于我的写作至关重要，在此向马老师深表谢意。还要感谢我的良师益友车红梅老师，从大学到现在，她一直是最支持我、最信任我的人，我的学习动力直接来源于她的鼓励，借此机会，我要发自内心的感谢她。

最后，就是那些我可亲、可爱的朋友们、同学们。感谢高旭姐姐一直对我的关心和照顾，感谢尹秀丽、任超对我的支持和鼓励，和他们相伴三年我很快乐，希望大家今后一切顺利。还要感谢我的好朋友慕巍、任诗桐、袁子婷，是你们的鼓励让我坚持到了最后，有了你们我很幸福。

如今，我已为人师，我要把我所学的知识毫无保留的传授给我的学生们，更

要把我的老师们的崇高师德传承下去，让我的学生们也能得到我学生时代的幸福和满足。

最后，郑重的感谢黑龙江大学对我的培养，愿母校明天会更好。